

学校代码：10270

分类号：

学号：122100046

上海师范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

法国第二帝国时期巴黎下层社会的 研究

学 院：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专 业： 世界史

研 究 方 向： 法国城市史

研究生姓名： 冯 瑾

指 导 教 师： 陈 恒

完 成 日 期： 2016.3.28

第二帝国巴黎下层社会的研究

摘 要

巴黎，是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从占地面积仅为 0.5 平方千米的小渔村到最终发展为现代大都会，经历过世代代的变迁和嬗变，它的历史波澜壮阔，光辉灿烂。巴黎城市历史的沿革和变迁以及她的建设和发展为人类现代大都市的规划、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全面的思考、借鉴和经验。

19 世纪中叶，随着拿破仑三世执政的第二帝国的建立，在奥斯曼引导的城市改造运动中，巴黎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城市化进程显著加快，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铁路运输系统逐步完善。巴黎在此期间经历了它历史上最大的变化。本文选取“下层社会”的角度，作为一种社会研究的方法，以自下而上的史观去探究 19 世纪第二帝国巴黎城市化进程最快时期的社会现象，揭示社会转型背后的现实、社会结构的转变以及社会阶级之间冲突的真正原因。

第一章介绍了第二帝国时期巴黎的历史背景，详细介绍了第二帝国时期交通运输业、农业的发展状况。银行体制改革也是第二帝国时期经济变革的重大标志。巴黎作为法国首都也必然受到了工业革命深远的影响。奥斯曼所领导的巴黎改造运动都是这一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对整个巴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第二章从社会学、政治学角度分析了法国大革命后法国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结构转变问题。笔者认为现代社会结构突出的特征是开放性、流动性以及社会成员的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的空间显著提升。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和成员依据新的社会标准、权力、财富、声望和职业等确立自己的地位及与其他社会群体、成员的关系，由此建立新的社会结构的框架。

第三章重点刻画了巴黎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笔者探讨了帝国时期巴黎下层民众的住宅情况，下层阶级妇女状况以及他们的日常交往，最后探究了商品化的“景观和休闲”对下层民众的影响。

第四章重点阐述了巴黎下层社会与上层社会矛盾加剧与割裂的情况。社会思潮的冲突日益显著，经济分化日趋严重，下层阶级在艺术作品中的表达以及分析了下层阶级与上层阶级社会心态的不同。

关键词： 第二帝国 巴黎 城市 下层社会

Abstract

Paris, as a famous historical city and international modern city, occupie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position with its unique, extraordinary city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artistic charm. Writing a glorious page in the human civilization, Paris becomes a bright pearl in the world city. Opening the historical huge volume, a thousand years a small fishing village, Xi Dai island as the center before two thousand years, covers an area of only 0.5 square kilometers, after generations of the rise and fall, eventually becomes a modern metropolis. Marshes, inexorably, Paris's urban history evolution and changes, its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rovide comprehensive thinking, and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for the planning,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metropolis.

In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econd Empire of Napoleon III in power, is guided in the Ottoman urban reform movement, Paris has undergone major changes, urbanization process accelerated significantly,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labor into cities, railway transportation system was gradually improved. During this period Paris experienced the change of its history the biggest. This paper selects the "underclass" point of view, as a kind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lower population starting to explore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Second Empire Paris during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period of social phenomenon highlights, reveals the real reason behi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reality,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class conflicts.

The first chapter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of Paris in the second period, the reform of the banking system unde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Franc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ari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Osman is a major historical event in this period.

In the second chapter, from the angle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s, the French society from the traditional to the modern structural evolution of the typ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a prominent feature of the modern social structure is openness and mobility, the horizontal flow and vertical flow of the members of the society. A variety of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and members based on the new social standard Quasi, power, wealth, prestige and occupation etc. to establish themselves and with other social groups, members of the customs the department, thereby establishing a framework of the new social structure.

The third chapter mainly depicts the daily life of the people,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housing problem in Imperial Paris, the lower class status of women and the lower people's daily life.

The fourth chapter focuses on increasing between the lower society and society. The conflict of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 is increasingly obvious, the economic differenti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news managemen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tense.

Key words: The French Second Empire; Paris; City; The lower society

绪 论.....	8
第一节 选题缘由.....	8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9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14
第一章 第二帝国时期巴黎社会的历史背景.....	16
第一节 第二帝国前夕的巴黎.....	16
第二节 奥斯曼的巴黎改造计划.....	18
第三节 法国社会结构的分层及演变.....	21
第二章 巴黎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	27
第一节 帝国时期巴黎下层民众的住宅问题.....	27
第二节 帝国时期巴黎城下层阶级的妇女状况.....	30
第三节 下层民众的教育状况.....	34
第四节 巴黎下层民众的公共卫生.....	37
第五节 巴黎下层民众的日常交往生活.....	44
第四章 巴黎下层社会与上层社会的矛盾与割裂.....	46
第一节 社会分裂的根源.....	46
第二节 社会思潮的冲突.....	48
第三节 经济分化日趋严重.....	55
第四节 下层阶级在艺术作品中的呈现.....	62
第六节 巴黎下层阶级与资产阶级以及贵族的心态对照.....	70
致谢.....	72
结论.....	74
参考文献.....	77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缘由

巴黎之所以如今成为世界性的都市与 100 多年前的奥斯曼的巴黎城市改造运动密不可分,探究巴黎城市历史的沿革和变迁以及它的建设和发展对人类现代大都市的规划、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全面的思考、借鉴和经验。

19 世纪下半叶伊始,随着拿破仑三世登台后,巴黎就被他计划打造成其权利的丰碑。奥斯曼领导下的“巴黎改造计划”就是其最为得意的作品。奥斯曼依据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原则让巴黎成为了“现代都市”的典范:宽敞的道路和大街,便利的交通,完善的卫生、排水系统等等。资本成为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造运动”之魂。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城市越来越具有竞争力,吸引着更多的农民放弃土地,向城市移民。法国大革命以后,社会结构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的演变:由一个以出身决定社会地位的封闭体系转为更为开放,流动性更强的社会结构体系。中产阶级不断壮大,财富成为了衡量人们身份地位的标准。在此其间,工人阶级的队伍也不断壮大,农民由于自身教育的提高以及意识形态和观念的转变,纷纷涌入城市,在城市里获得了更多地就业机会。第二帝国的巴黎以“现代都市女王”的姿态傲立于全世界。

可是,帝国宏伟繁荣的表象下终究难掩其隐患。生活在底层的工人阶级、农民以及社会的边缘群体充满了苦难和贫穷。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不断加剧,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工人阶级只能是离政治舞台越来越远。自由帝国里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分裂最终导致了巴黎公社运动的爆发原因之一。资产阶级的理性和进步的价值观受到了重大的挑战,一些游走在社会边缘的艺术家及追随者用现代性的艺术和神秘主义来反抗资产阶级所宣扬的那套价值观和伦理道德。

本文选取“下层社会”的角度,作为一种研究社会的方法,从下层人群的角度出发去探究 19 世纪第二帝国时期巴黎城市化进程凸显时期的社会现象,揭示社会转型背后的现实、社会结构的转变以及社会阶级之间冲突的真正原因。

关于“下层阶级”的定义,笼统地可以用排除法定义为“除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其他全部的民众”,但是这种概念的定义较为模糊,从学术标准上来说,可以从职业划分甚至精确到收入的标准来鉴定下层阶级的划分。从职业划分来说,手工业者、工人、农民,包括流浪汉、乞讨者这些社会边缘群体都划分为下层阶级。另外,从统计学的角度,设定一个收入标准是最为精确和严谨的方法。但是

如何划定收入的标准具有相当大的难度。所以,本文主要还是采用前两种的定义模式。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一) 第二帝国的综合研究

对于第二帝国的研究,国外的历史由来已久,历史学家通常把第二帝国描述为一场政治两幕剧。他们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高压政治和路易波拿巴的性格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经历重建的时期,历史学家的兴趣发生了转向。他们从那些被评为政府的建设性“技术专家政治论”的功绩,尤其是巴黎的重建、“现代”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等,从经济快速增长所需条件的创造中寻找研究素材。近年来,地方社会历史学家对这一时期的研究逐渐增多,他们关注城市和农村大众的经历,为第二帝国时期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

研究第二帝国的背景资料可谓浩如烟海,笔者选取了对这一时期的法国社会作了通史性历史研究的基本著作:夏尔勒(C.Charle)的《19世纪法国社会史》(*A Social History of French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麦克佩(P.McPhee)的《1780至1880年的法国社会史》(*A Social History of France, 1780-1880*),派拉斯(R.Price)的《19世纪法国社会史》(*A Social History of Nineteenth Century France*),这些书目对整个19世纪时期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对第二帝国的综合研究,笔者参考了以下的数目:艾查尔所编著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历史词典》(*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French Empire*);杜拉德(J.Tulard)的《第二帝国词典》(*Dictionnaire du Seconde Empire*);布莱西斯(A.Plessis)《第二帝国的兴盛和衰亡》(*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econd Empire 1852-71*),作者对于普选被逐渐接受第二帝国时期的政治经济的发展作了专题研究,大型工业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以及印象派现代艺术的诞生也是其主要的研究内容。他指出一个悖论,即第二帝国在逐步自由化以后,最终通过选民得到了背书,可惜几月以后,帝国大厦就全部倒塌,这是个创新和停滞,困惑和希望不断交织的时代;还有一本史密斯(W.H.C Smith,)所著的《1848至1871年法兰西第二帝国及公社》(*Second Empire and Commune: France 1848-71*)。

(二) 巴黎城市史的综合研究

19 世纪的巴黎作为现代都市的典范，国外对其研究程度较为深入，不光论文、专著的数量多，且涉及不同学科领域面很广。

大卫·格里奥切(David, Garrioch)的《改革时期巴黎城市的形成》(The making of Revolutionary Paris)对 18、19 世纪巴黎城市发展的做了深入的历史性的描述与分析。作者以社会史的视角来观察当时社会底层的市民生活，包括：城市平民、工人等。在对“弱势”群体进行关注的同时引伸出对城市政府的管理的关注。最后，预言一个全新的巴黎即将诞生。贝尔纳·马修(Bernard, Marchand)的《19 至 20 世纪的巴黎城市历史》(Pairs, histoire d'une ville XIXe-XXe siècle)从历史的角度全面系统地分析、介绍巴黎 19、20 世纪的发展史，是一本难得的巴黎城市史著作。诺尔马·埃文森(Norma, Evenson)的《巴黎：1878 至 1978 百年的变化》(Paris: A Century of Change, 1878-1978)从 1878 年开始叙述，描述了 100 年巴黎城市的发展演进状况，作者从城市规划、人们的日常生活、城市文化、城市更新等角度，多视角的来审视 100 年来巴黎的发展，这是一本了解 100 年来巴黎城市发展的较详细的著作。

除此通史性著作外，也有很多是从巴黎的城市发展不同方面入手，以专题的形式描述 19 世纪的巴黎，让我们从不同视角来认识巴黎、了解巴黎。道纳德(Donald)的《巴黎下水道及下水道工人》(Paris sewers and Sewermen)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下水道，给我们分析了巴黎城市下水道的发展历程以及下水道工人的生存状况。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David)的《意识及城市经验》(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是一本 19 世纪的巴黎城市经济建设史著作。作者从地理学、经济学角度来分析 19 世纪巴黎的经济发展，并深入分析了经济发展对城市发展建设的影响。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1975 年编写的《巴黎街道的轨迹：形成，拓扑，功能》(Le trace des rues de Paris: formation, topologie, functions)，这是一本关于巴黎城市道路发展历程的著作，作者从城市规划学、城市建筑学角度对从 16 世纪以来巴黎的城市道路规划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19 世纪的法国文学是世界文学中的一颗明珠，几乎每个伟大的文学家都有涉及对巴黎的描绘和评论。从巴尔扎克到左拉，从兰波到波德莱尔，无论小说还是诗歌，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巴黎”作为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经常描述的空间形象，承载着作者对于这座城市及人民甚至整个法国关注的目光。文学作品是虚构的，但是我们却能够从中窥探到真实的历史事实和细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左拉的系列自然主义的小说，波德莱尔的诗歌都把目光投向了巴黎的底层社会和民众，从波德莱尔的作品中还引申出“漫游者”的概念，此概念被本雅明发扬广大。娼妓、拾荒者、赤贫而净耍老把戏的老小丑、衣衫褴褛的老头、美丽而神秘的女郎都成了都市戏剧中不可或缺的角色。皮埃尔

(Pierre,Citron) 所编著的《从卢梭到波德莱尔的法国文学中的巴黎诗歌》(*La poésie de Paris dans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de Rousseau à Baudelaire*) 中选取了文学巨匠中有关巴黎的诗歌, 文学作品中的巴黎也经历着与其本身一样的变化。

(三) 奥斯曼化的“巴黎”

西方史学界对“奥斯曼改造计划”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学派。从本雅明到列斐伏尔, 一直到现代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城市理论进行探索的大卫·哈维, 都对这一问题有过阐述, 甚至还著有专著。在奥斯曼的改造下, 巴黎成为了“现代性”都市的范例, 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大都基于对“现代性”的批判建立自己的理论的。本雅明对 19 世纪巴黎研究的兴趣体现在他的《拱廊研究计划》中, 这项研究起源于 1925 年, 一条著名的拱廊“歌剧院拱廊”被拆毁, 这件事深深刺激了本雅明, 拱廊在当时作为现代性的象征, 在 18 世纪刚被建立后, 突然成为了“古代性”的废墟, 于是“拱廊拆毁所引起的失落感, 让本雅明敏感地意识到现代性的非永恒特征、变动不居性。”正如《城市百科》中提到: 本雅明认为 19 世纪的巴黎是做“资本”的城市, 其自身融合了魅惑、迷幻、神秘的意蕴。本雅明试图揭开这层虚幻的面纱, 从两个重要的物质方面揭露现象背后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现代人一方面对商品及其崇拜, 另一方面建设大量的奢华建筑(新的大道、火车站、世界博览会, 当然还有拱廊) 并将其视为“梦想之屋”, 正是通过对“现代性”具有乌托邦性的想象的破灭, 本雅明希冀“唤醒”城市景观, 目的是刺激人们集体从对刚刚逝去的自满的梦境中苏醒。最具影响力的空间理论学家, 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亨利·列斐伏尔也对巴黎的改造计划提出过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空间扩张和重组是资本克服自身危机的外在标志, 此观点恰好解释了奥斯曼实行“巴黎改造计划”的重大原由之一在 1850 年左右, 巴黎受到了严重的资本危机的影响。这次危机与以前由自然灾害或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不同, 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臻于成熟时产生的资本与劳动力出现大量剩余现象时产生的, 奥斯曼所进行的“巴黎改造计划”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此原因。另外, 列斐伏尔也对奥斯曼改造的巴黎提出过尖锐的批评: “如果奥斯曼开辟了林荫大道, 如果说他规划了那些大广场, 那并不是为了取得优美的街景效果, 而是为了要用机关枪扫射巴黎’, 男爵对此毫不隐瞒。”这种观点本雅明在《奥斯曼与街垒》一文中也提到“奥斯曼作品的真实目的是想保证巴黎城免于内战。他想使巴黎永远无法设置街垒。”1830 年与 1848 年两次的革命中, 街垒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奥斯曼打算提报给街道拓宽和在兵营和平民区间提供最短的路线这两种方法设置了“帝国的街垒”, 讽刺的是后来发生的巴黎公社运动粉碎了这一看似坚不可摧的“街垒”。当代的对于这一问题研究取得突出成果的美国城市理论学家大

卫·哈维,他于2003年出版的《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是本对于奥斯曼的巴黎改造研究的专著。如同本雅明一样,哈维也不断揭开“现代性”神话的面纱,称奥斯曼的改造是“创造性的破坏”,但不同于本雅明的是,哈维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注入到此项研究中,他对巴黎改造过程的分析就是以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为理论工具,坚持马克思物质生产方式与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本路径,从资本积累出发,基于总体性视角解释资本主义如何生产自己的地理景观,以及现代主义情感体验转变的深层根源。而在本雅明那里,只有空间,漫游者,外部空间,碎片和体验,缺乏一套连贯的理论框架作支撑。哈维也同时承袭了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但与列斐伏尔试图把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置换为对资本的“空间批判”,哈维试图弥合马克思和列斐伏尔两者之间的断裂,把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描述为“资本主义的地理景观的生产。”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空间上研究不足:“它准许对资本主义历史变革的研究,却忽视了资本主义怎样生产了她自己的地理这个问题。”哈维通过对19世纪巴黎城市空间的考察来探究资本主义兴起这个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传统问题,由于选取了地理学家这个独特的视角,理论上有不少新颖的创建。

学术界另一个讨论的热点问题是前奥斯曼时期的“现代性”问题。一般认为,奥斯曼改造的巴黎是巴黎自身具有“现代性”的开始,而奥斯曼只是这项运用中最完美的执行者,巴黎曾经举行了一个学术研讨会^①,会议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奥斯曼之前,巴黎经历了多少奥斯曼化?”换句话说,奥斯曼之前的巴黎体现了多少的现代性?该会议集结了28篇历史学家的论文,从社会、文化、文学、艺术、建筑、城市主义等多个领域探讨了前奥斯曼时期的现代性问题。

(四) 阶级问题

根据多马尔(Daumard)所著的《19世纪法国财富状况》(*Les fortunes francaises au XIXème siècle*)中建构的1847年巴黎人的财富状况,以社会经济范畴生动描绘出财富分配。其中主要可分为四个族群。最顶端的是上层资产阶级,包括了企业人士(商人、银行家、管理者与实业家)、土地世绅与高级公务员。此阶级只占了总样本人口的5%,却继承了75.8%的财富^②。下层阶级占了人口的四分之三,却只拥有0.6%的财富。介于两者之间的则是上层中产阶级以及下层中产阶级。阶级结构中的财富分配极为悬殊。巴黎的阶级机构在第二帝国时期出现了全面性的改变。到了1870年,旧日阶级关系模式的轮廓——传统地主、手工工人与工匠、店主与政府雇员——仍很容易辨识。但此时另一种阶级结构却牢牢压在旧阶级关

^① 该学术研讨会于1999年6月在巴黎举行,题目就是《前奥斯曼时期的现代性:1801至1853年巴黎城市空间的形成》(*La modernité avant Haussmann: Formes de l'espace urbain à Paris, 1801-1853*)。

^② A. Daumard, *Maison de Paris et propriétaires Parisiens au XIXème siècle*, Paris, 1965, p. 58.

系模式上，并杂糅国家垄断式的资本主义（由新上层资产阶级所操控）以及在资本主义生产与交换关系下，巴黎各领域的小规模工业与商业所不断涵盖的各种劳动（手工工人与技术工人）。无技术工人逐渐将手工工人的力量消耗殆尽。经济力量也在这样的结构下转变。金融家巩固自身在工业界与商业界一至少在巴黎一所拥有的权力；工人当中则有一小部分开始在人数不断增加的无技术劳工与贫民中取得劳动贵族的特权地位。

本文旨在研究下层阶级，因此工人阶级当属重中之重。杜福（G.Duveau）所编著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工人生活》（*La vie ouvrière en France sous le Second Empire*）详尽完整地展现了第二帝国时期工人的生活的画卷。马格里所编著的《法国工人阶级史》第一卷中对第二帝国时期工人生活情况作了专门的研究。

从列斐伏尔到加亚尔（Gaillard），各持立场的学者认为奥斯曼的改造工土地投机以及帝国统治瓦解了传统的共同体意识，但却未能代之以稳固之物。另外一些学者则主张，行政机构拒绝任何形式的地方自治，此举成了巴黎市民的肉中刺。因此，巴黎公社可以诠释成阶级联盟的一种尝试，企图重新找回已经丧失的共同体意识，重新回到过去被迫迁出的市中心空间，以及重新主张身为巴黎市民的权利。

大卫·哈维在他的《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这本书里认为奥斯曼所推崇的是一个新颖而现代的共同体概念，金钱的力量在其中占据主导作用。这种共同体形式为：“建立于帝国的荣光之上，并且流淌着权威、慈爱、权力与进步的象征，他希望将巴黎的流浪者汇聚起来，奥斯曼利用公共工程、万国博览会、大型节庆等来建立与专制统治、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与新国际秩序兼容的共同体意识。”可见，随着19世纪法国巴黎社会经济的发展，金钱成为了越来越压倒性的力量之后，共同体意识与经验出现了重大的变化。

（五）国内相关的研究

国内关于巴黎城市发展的专著不多，从现有的著作来看多集中在城市规划、城市地理、城市经济领域，基本上是对巴黎城市建设的介绍，没有一本对巴黎城市发展做出深入的探讨。这方面的书主要有：梁承庭《法国巴黎公共交通研究与借鉴》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1990版；沈玉麟《外国城市建设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世界大城市规划与建设》世界大城市规划与建设编写组编，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版；钟纪刚编著《巴黎城市建设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版。

关于巴黎的城市经济建设，目前就本人收集到资料来看，所涉及到文章不多，更多的是对法国的经济和工业化的总体介绍和概括研究。关于巴黎的有朱晓龙、

王洪辉的《巴黎工业结构演变及特点》(载《国外城市规划》2004年第5期)一文对一个世纪以来巴黎经济尤其是在工业方面的发展进行了归纳,并探索了经济发展演变的规律以及城市发展对产业结构产生的影响。关于法国经济和工业化的专题论文有,陈崇武、金晓常先生的《关于法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特征问题》(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哲版1985年第1期)对法国近代化的特征作了开拓性的初步总结。楼均信先生的《试论法国的工业近代化》(载《杭州大学学报》社哲版1991年第3期)阐明了法国工业革命的分期和工业近代化的特点。王家宝先生《试论法国第二帝国现代化的条件》(载《世界历史》1991年第1期)对一个时段进行了考察。此外,计翔翔先生的《近代法国城市化初探》(载《世界历史》1992年第5期)、王家宝《近代法国人口量变轨迹与原因》(载《世界历史》1994年第5期)、汪建丰先生《略论1830—1870年法国铁路建设》(载《史学月刊》1991年第2期)等都从不同角度来探讨法国的工业化。这些文章虽不直接关系到巴黎城市的发展,但对整个法国的考察,尤其是对19世纪的考察有助于了解19世纪法国的整体经济发展从而加深对巴黎城市经济发展与建设的理解。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本文主要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去探究法国第二帝国时期巴黎城市的发展与改造和下层社会的关系。选取“下层社会”的视角,以自下而上的史观探究这一时期的巴黎城市发展史是本文的一大创新点。在史学领域的漫长时期,“下层阶级”是被忽视的群体,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中集体失声。19世纪具有重大影响的史学流派——兰克学派主张政治史、外交史及军事史的研究,史学的研究对象聚焦在上层建筑。然而自从20世纪的以来,随着法国“年鉴学派”以及五六十年代在欧美各国兴起的“新史学”的蓬勃发展,史学领域开始关注下层社会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下层群体。“总体史”的概念注入了新的史学思想。想要完整地研究某一时期的历史,下层社会成为了必不可少的研究对象。

另外,笔者运用大量丰富的历史资料,作为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下层民众的住宅情况,妇女生活状况(包括教育,就业等),交际生活和休闲景观与下层民众的关系这些角度勾勒出了第二帝国时期巴黎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图景,其中最后一章“休闲景观对下层阶级的影响”是本文的又一个创新点。巴黎城市改造运动促使了城市公共空间的“休闲化”和“商品化”,下层阶级从这场改造运动中受惠于前者,同时也受累于后者。这种两重性的张力关系构成了休闲景观与下层阶级的关系。

最后一章中,笔者选取从下层阶级在艺术作品的呈现以及不同阶级的心态对

比这些新颖的视角也是本文的创新点。19 世纪活跃于法国画坛的印象主义率先将绘画的对象转移到下层群体，尽管这并不是他们主要的创作题材，但是从中也可窥探出下层群体开始受到了知识份子领域的关注。研究下层阶级与贵族以及资产阶级在第二帝国时期不同的心态又是本文的另一个创新。“心态史”是新史学中重要的组成的部分，心态滞后于经济，而观念滞后于心态，研究不同阶级的心态对于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也有一定的作用。这些较为有意思的部分，笔者只是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仍然值得进一步的挖掘和完善。

第一章 第二帝国时期巴黎社会的历史背景

1789 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以后，全国进入工业化的起步阶段。第二帝国时期是法国工业化发展最为关键的时期。在帝国皇帝路易·波拿巴的意志和野心的驱使下，奥斯曼主持了一场对巴黎的“整容手术”。这场持久的“巴黎改造运动”不仅让巴黎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缓减了城市的固有顽疾，对巴黎乃至世界其他现代性城市的更新与建立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第二帝国前夕的巴黎

19 世纪中叶的巴黎是座生病的城市，城市的急剧扩张，人口迅速增长，由此种种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旧的社会框架已经无法适应城市日益增多的人口和新的社会结构。法国的工业化进程具有时间长，速度缓慢的特点。根据巴黎商会（La Chambre de commerce de Paris）在 1847 年至 1848 年的报告中显示：“在巴黎登记注册的 64000 家企业中，只有 7000 家（占 11%）拥有超过 10 个工人，25000 家企业雇佣了 2 至 10 个工人，其他 32000 家企业（占总共企业 50%），只有一位老板和一个工人工作。”^①可见，此时法国企业规模较小，工业化程度并不高。这个时期的巴黎产业分布如下：城市中最为活跃的中心是巴黎第六区 [Port-Saint-Denis（圣德尼门），Lombards（伦巴第大街），Saint-Martin-des-Champs（圣马丁花园）]，那里是手工业者的集中地，主要经营青铜和糖果店；巴黎第二区（Chaussee-d’Antin, Faubourg-Montmartre Feydeau Palais-Royal）集中了鞍具业、车身制造业、服装业等；第七区主营（Mont-de-Piété Arcis）冶金业。家具制造业还是位于传统的工商业混合区——圣安东万近郊（faubourg de Saint-Antoine）。工人队伍中不可忽视的一群是建筑工人，他们大都来自法国中央高原地区（Le Massif central），除了建造房屋，他们也用于防御工事。在市郊的北部集中了巴黎大型工业区（制造铜和锌）。

1832 年和 1848 年巴黎都遭受到了霍乱的侵袭，疾病在人口稠密区肆虐，使得巴黎遭受了剧大的损失。巴黎的社会问题积重难返，诸如恶劣的住房条件、不便利的交通等都已成为城市的顽疾。

^① François caron: Histoire economique de la France, xixe — xxe siècles, Paris, 1981, P57.

（一）恶劣的住房条件

恶劣的住房条件首先与急剧增长的人口有关，有些地区已经达到了饱和状态。1843年，据统计显示巴黎48个地区的人均占地面积为：“只有4个地区（都是郊区）人均占地面积超过100平方米；10个地区的人均占地面积为50至100平方米；20至50平方米的有10个地区“低于20平方米的有24个地区。最低的三个地区为伦巴第（9个），马赫歇（9个），阿赫西（3个）。"^①1850年的情况更为严重了。“第四区（现今的第一区和第四区的一部分每公顷拥有1000个居民，每位居民平均占有12平方米的土地。在巴黎中央市场地区，每公顷的土地拥有超过1000个居民，每人只占有8平方米的土地。1851年，巴黎只有一个地区的人口不增反降，这就是第7区（如今的第3区）：1817年每公顷拥有居民800个；1831年和1851年分别降至850个和960个。”^②由数据可见，如此稠密的人口密度加剧了住房条件的紧张，居民们被迫挤在狭小的空间。

除了住房的空间狭小，住房周围环境的脏乱、不卫生的情况也日趋严重。时任1840年巴黎警察局长的弗埃歇里叶（Frégier）认为“某些地区脏乱的环境是由于人口过密的影响，例如圣宝莱地区以及阿尔西地区。然而另一些地区圣雅克地区，圣马赛勒地区环境的恶劣并不是因为人口稠密，而是因为1847年遭受了霍乱的侵袭，死亡率攀升至4.7%”^③。

脏乱的卫生环境还因为缺少排水渠这些基础设施造成的。巴黎某些居民会把院子当作粪池来使用，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讲卫生、没素质，而是因为他们处理排泄物别无他法。“某些院子只有4英尺高，却堆满了垃圾。房门朝着院子敞开；位于6楼的茅坑总是容易把排泄物流到楼梯上，最终底楼也被它淹没了。”^④简陋的住房条件以及恶劣的住房环境极易导致霍乱等流行病的肆虐以及起义的爆发。

（二）不便利的交通

在19世纪中叶，巴黎街道的平均宽度为12米。某些特殊的街道宽距更大，比如香榭丽舍大道，左岸大街，黎伏利大街(Rue de Rivoli)。但是大多数的街道都未超过7米，某些仅仅只有2到3米的宽距，尤其在西岱岛内部。^⑤当时的巴黎市民对巴黎的交通怨声载道，考察实际的交通状况，确实不尽如人意。“1851年在巴黎市通行的车辆有60259辆，而1952年有1311000辆车；1851年发生了

^① Perreymond, *Revue générale d'architecture*, 1843, p.26.

^② Ibid. p. 27.

^③ Frégier, *Les classes dangereuses de la population dans les grandes villes et des moyens de les rendre meilleures*. Paris, 1840, 2 vol. P.151

^④ Ibid. p. 30.

^⑤ Meryon, *La circulation à Paris et dans le déplacement de la Seine*, Paris, 1961, p.56

380 起交通事故（24 例死亡，356 起受伤），而 1951 年则发生了 1951，417 次交通事故，7829 人受重伤，17719 位受轻伤。”^①

1840 年的一份对于巴黎 12 个大区交通状况评估报告如下：^②

第 1、2、3、4 区：总体满意；

第 5 区（圣丹尼斯大街）：零售商聚集区，道路较少；

第 6 区（市中心；圣丹尼斯和圣马丁大街）：人口极为稠密，交通非常拥堵；

第 7 区（阿尔西地区）：交通情况最糟糕的；

第 8 区（圣安东尼）：情况马马虎虎；

第 9 区（圣保罗）：这个街区情况比较悲惨；

第 10 区（圣日耳曼市郊和巴黎的西南部）：许多传统的贵族的住宅区，他们的开销比往日减少了，但是仍旧富裕。这些地区某些街道的零售商与很活跃：圣父大街，塞纳大街等；

第 11 区（卢森堡）：社会构成极为复杂；几乎没有公共建筑；

第 12 区（巴黎的东南部）：这个地区一直被忽视。

第二帝国前期的巴黎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产生了许多城市病。由于城市工业的扩张急需大量的劳动力以及铁路网的形成使得全国的交通更为便捷，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的人口急剧增加，巴黎的情况尤其严重。伴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产生了许多负面的效果：城市的各项基础设施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城市环境恶化，污染严重。受低工资和工作以及生活环境恶劣的影响，人们生活困苦，贫民窟遍地，贫富差距空前拉大，犯罪率不断攀升，这些棘手的社会问题令执政当局颇为头疼，为了缓解这些问题，政府决定扩大城市空间，改造生活环境。“巴黎改造计划”在奥斯曼的带领下立即启动。

第二节 奥斯曼的巴黎改造计划

19 世纪中叶巴黎的城市改造的总指挥就是热豪热·欧热勒·奥斯曼。这是他此身最得意的作品。巴黎这座城市历史悠久，人口密度大，城市基础设施落后，排水系统常常出问题引起疾病的流行。种种问题积重难返。奥斯曼决定彻底改变这种情况。“巴黎改造计划”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计划，奥斯曼用他的“整体观”对巴黎进行系统地改造。奥斯曼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任何一项计划都不是孤立的，每一条新的道路都联系在一起，绿化种植则是为了界定一般的道路和林荫

^① Ibid. p.68.

^② Ibid. P.89.

大道。”^①这种“体系”的概念一直贯穿在整个改造计划中。

（1）道路体系

奥斯曼对道路的改造可谓是大刀阔斧。他设计了“大十字”和“环路”的交通性城市干道格局，使得城市交通体系更为方便和明晰。东西向交通干道是将离我理与圣安东尼奥大街联结，穿过巴士底广场一直延伸到民族广场；向西通过协和广场与香舍里写大街联结，一直延伸到星形挂广场。南北向的主要交通自北向南为景观道路。这些主干道的建设大大缓解了中心城区的交通状况，改善了城市的拥挤问题。宽阔的街道使得周围的景观焕然一新。

（2）基础设施体系

这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地下巴黎”，为了解决水量和水质的问题，奥斯曼在离巴黎百公里的地方寻找到了丰富的清洁水源，建设了两条引水渠、两个蓄水池；其次建设了一个输水系统将水送到千家万户。另外，除了供水系统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巴黎排水系统的改造被认为是最完美的杰作。1854年奥斯曼学习了英国的经验，决定将下水管分等级，同时，他命令将已有的下水道拓宽，形成一个与供水系统相匹配的地下水系统。巴黎的下水道建制就像一个地下城市，每条街道地下都有宽敞的下水道，也没有杰明，一部分的下水道被规划成为下水道博物馆，这是巴黎的观光景点之一。这套下水道系统大大改善了城市尾声情况，使得巴黎更为舒适，更洁净。

（3）绿化体系

奥斯曼的在他的城市规划中，开辟了大型的公共绿地：2个森林，4个公园。，2个花园，19个广场，无数小广场。奥斯曼在他的回忆录中忒恶强调了公园对城市居民的健康的重要性，他称之为“城市之肺”，在公园里市民可以享受到充分的阳光，新鲜的空气与开敞的空间，另外它还间接地有效地加强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联系。

巴黎的城市改造体现了奥斯曼的额“体系”思想，这种对原有的城市进行体系化的改造对以后的城市规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巴黎改造计划的评价

对奥斯曼进行的“巴黎改造计划”的褒贬至今争论不休，但是毫无疑问，奥

^① Haussmann, *Mémoires du Baron Hausmann*, Paris, 1890, p.78.

斯曼把巴黎从一座中世纪的城市转变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大都市，实在功不可没。从此，奥斯曼的“巴黎”成为了法国其他城市的范例，它对欧洲其他国家城市的改造也有深远的影响，至今巴黎的更新对我国的城市规划也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在得到赞誉声音之时，对于这项改造计划的诘难始终不绝于耳，甚至还异常的强烈。对“奥斯曼的巴黎”的职责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方面是针对改造计划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是属于审美范畴。前者主要是指伴随着巴黎改造计划，许多社会问题应运而生，诸如不动产的投机行为猖獗，城市住房紧张以及产生的社会阶级的对立、矛盾的激化和社会风气的堕落，这点可以从后来发生的巴黎公社运动中得到了证实。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社会问题已然消失在历史中，可是后者对于审美领域的批判至今被许多“怀古主义者”所诟病。具体是指奥斯曼建筑的沉闷单调以及他对老巴黎建筑的拆毁是被人责难最多的，其中最令人遗憾的是他为了修建一条贯穿南北的大道，对西黛岛——这座法兰西文化的摇篮的岛屿进行了整体的拆毁，这座岛屿本身就是中世纪建筑的艺术博览馆，现在只剩下几件诸如巴黎圣母院的艺术品放在了现代的橱窗里。在对奥斯曼的批评中，尤以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大师雨果最为激烈，他甚至将其比作“汪达尔主义”，第二帝国时期，雨果流亡海外，当有人问他是否想念巴黎时，他说道“巴黎只是个理念，至今其余的就是沃利街，我一直很讨厌里沃利街。”其他诸如龚古尔兄弟以及左拉等文人表达了对于新巴黎的单调、乏味感到失望。

我认为应该如何评价，我们应该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首先必须承认的是奥斯曼改造的巴黎给如今的巴黎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宽阔的道路，完备的下水道系统，景色迷人的公共绿化都是巴黎如今依然是世界上最具魅力的城市之一的重要因素。奥斯曼对巴黎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我们也应该倾听那些批评的声音。文人些许有崇古德情怀，对老巴里的逝去的唏嘘可以理解，雨果多少处于自己反对帝国的政治立场对于帝国荣誉的象征——巴黎改造计划进行挞伐，总之，我国正处在城市化的高峰期，如何从一个半世纪前的奥斯曼对巴黎的改造计划中甄优去劣，汲取的是，方能对我国的城市规划与建设有所启迪和帮助。

第三节 法国社会结构的分层及演变

19 世纪的法国社会结构发生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由社会门第出身为衡量社会地位唯一标准的传统封闭社会逐渐地转向以资产和个人能力为社会地位升迁依据的开放性的现代社会。传统社会的阶级固化被打破，新社会的活力机制被激发了，社会群体间水平和垂直双向流动。

（一）法国社会分层的嬗变

自从法国大革命以后，19 世纪的法国的社会结构就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结构的演变。传统社会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然而现代社会结构相对比较开放。从本质上来说，传统社会以血缘和出身为纽带连接的社会结构，在这个社会中，个人所获得的财富或成就并不取决于自身的努力，而是凭借着自身所出身的家庭环境以及阶层所处的社会地位。在这个社会中，社会结构本身是超稳定的，因为它没有提供给社会成员上升的空间，整个氛围是僵化且闭塞的。与此相对，这种关系在现代社会中被打破了，现代社会成员获得财富，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获得更多的尊重并不依赖于家庭出身所在阶级，而是通过个人努力奋斗所获得的财富或者社会认同，原先的门第关系的影响逐渐减少。在现代社会中社会的上升通道被打开了，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可能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的机会，原本处于高端阶层的社会成员或群体也有可能向下滑落。现代社会结构演变就是以这种社会成员或者阶层之间的双向流动为主要标志的。从传统现代社会的过渡，一定会引生出社会结构的重新洗牌，一方面是社会阶层和等级遭到破坏以及社会原有的权力被解构，另一方面是社会性权力、财富和社会地位在各阶层的群体中重新整合及分配，从传统结构的消弭到现代结构的生成都要经历一个漫长、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在 19 世纪这个结构转变的时期，法院的人员组成并不单方面以阶级出身为依据，也不完全依靠个人才能，而是两者结合，看重出身高贵的能人。19 世纪前期显贵集团的出现在这个新老交替时期的显著特征。

显贵 (*grands notables*) 是指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任务，但这词在法国法院的概念中有着特殊的意义，1614 年的会议由于特权等级反对和平民一起开会，三级会议搁置，这样的话，每当国王有重大问题需要召开显贵会 (*les Assemblées de notables*) 商讨政策，与会的成员的要求全部是皇亲国戚以及贵族宠臣。1789 年三级会议的召开让这种特权阶级统治的显贵会议成为过眼云烟，但“显贵”并没有消失。法国大革命以后“显贵”的含义有了更新的涵义。拿破仑时期是显贵形成开始的标志，1801 年宪法规定，各省选举团成员必须从该省纳税最多的 600 名公民中任命^①，入选人员就是显贵名流，而政府通过各省的显贵的明录中选取符合条件的政府官员，这几项规定说明了显贵的划分标准已经发生了变化，以前显贵的组成的都是出身特权阶级的，现在更侧重个人的财富，有钱人的社会地位以及影响力在不断增加。立法院的议员以及政府高级官员的选择越来越重视这些拥

^① 阿·索布尔，《法国革命，1789—1880 年法国经济社会史》一卷三册，1976 年，第 131 页。

有大量财富的显贵，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强。

因为财富越来越被社会所重视和认可，显贵对财富的渴望也越来越大。共和十一年，伊泽尔省中纳税人中纳税最多的 600 名中贵族约有 100 人，商业资产阶级也有 100 人左右，首屈一指的是佩里埃家族，他们既是兼银行家，又是大地主和法律家，收入超过 5 万法郎有 5 人，其中 2 名旧贵族、2 名商人，1 名是靠国家财产致富的公证人，在伊尔维兰省的 1052 名显贵中，26 名将军，17 名是行政区官员，203 名市长或副市长，177 名法官，84 名土地食利者，50 名耕种者，67 名诉讼代理人。56 名公证人，48 名军人，7 名宗教界人士，另有几名掌管公共健康的官员以及商人，1811 年，在巴黎的显贵名流中，有 240 名土地所有者和食利者，72 名商人，54 名高级官员，22 名公证人，15 名银行家^①，拿破仑帝国时期的显贵名流主要分成三大类，一类是政府官员和军人等出身名流的人员，一类是法官，公证人和自由职业者，还有一类是完全凭借巨大的财富获得显贵的身份，这三个类别构成了帝国时期的统治阶层。大革命以前的旧社会的显贵来自于特定的贵族或者极个别的大资产阶级，而这个时期的显贵构成很难用唯一的标准去划分，这是旧制度和新秩序相互孕育而出的产物，财富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贵族逐渐式微，但是土地贵族以及大土地所有者仍然占有很大的比例。

随着拿破仑的下台，伴随着拿破仑的个人意志在国家各个领域的统治地位同样倒台，但是拿破仑时期的显贵的比重越来越大，这种趋势无法避免，影响越来越大。七月王朝开始，许多原先的土地贵族退出政治舞台，资产阶级成为新的显贵，比重也越来越大。佩里叶给这一时期的显贵定了个概念：“这时期的显贵名流的财富和地位远远要超过民众，官职的选拔取决于财富的多寡的比例越来越大，官职仍然是显贵追求的职业中占有最显要的位置。根据 1840 年议会统计的数据表明，行政官员约占 40%，土地所有者占 30%，其余 30% 为从事金融业的资产者，工商业者以及自由职业者，贵族里面官员所占的比例也很大，1848 年的数据表明贵族院 311 名议员中，有 220 名是高级行政官吏^②。七月王朝就是被这些显贵名流所统治并掌控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意见领袖都是由这帮显贵所把控。基佐，梯也尔，莱希特公爵等等各个行业的精英贵族就是这个显贵集团的最佳代言人，对于这个集团很难定性，“原因是由于他们自身地位和出身以及意志的多样性，所以他们所提出的任何意见和观点并不能反映他们本身的阶级属性。”。即显贵名流这个统治群体，仍然不能简单用资产阶级来简单概括，它本身就是那个过度时代的产物，身上烙印着时代的标志。

显贵既然是过渡时期时代的产物，那么随着时代的终结，他们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和社会客观的存在条件，逐渐地他们也将退出历史舞台。随着路易波拿巴的上台，第二帝国的建立，法国资本主义发展迅速，经济加快发展，现代性凸显。在这一历史背景条件下，拥有财富的阶级迅速整合靠拢，形成了强大的资产阶级。在这个时期，显贵逐渐式微，影响力逐渐减小。正是从这时起，显贵的影响开始下降。帝国初期，七月王朝时期的显贵名流还在国务会议，参议院和各省省长的职务上占有很大的比例，1852 年参议会议员全部由显贵名流组成，立法团中的三分之二为七月王朝的显贵，40 名国务会议参事中，24 人是显贵，另外各省省长也有三分之二为显贵名流^③。根据多马尔（Daumard）所著的《19 世纪法国财富状况》中建构的 1847 年巴黎人的财富状况，以社会经济范畴生动描绘出财富分配。

^① Apponyi, R. *De la révolution au coup d'état*, Geneva, 1948, p.123

^② .Becker, J. et Audoin, Rouzeau S. *La France, la Nation, La Guerre: 1850-1920*, Paris, 1995, p.78

^③ Chevalier, L. *La Formation de la population parisienne au XIXème siècle*, 1950, p.58

其中主要可分为四个族群。最顶端的是上层资产阶级，包括了企业人士（商人、银行家、管理者与实业家）、土地世绅与高级公务员。此阶级只占了总样本人口的 5%，却继承了 75.8% 的财富。下层阶级占了人口的四分之三，却只拥有 0.6% 的财富。介于两者之间的则是上层中产阶级以及下层中产阶级。阶级结构中的财富分配极为悬殊。巴黎的阶级机构在第二帝国时期出现了全面性的改变。到了 1870 年，旧日阶级关系模式的轮廓——传统地主、手工工人与工匠、店主与政府雇员——仍很容易辨识。但此时另一种阶级结构却牢牢压在旧阶级关系模式上，并杂糅国家垄断式的资本主义（由新上层资产阶级所操控）以及在资本主义生产与交换关系下，巴黎各领域的小规模工业与商业所不断涵盖的各种劳动（手工工人与技术工人）。无技术工人逐渐将手工工人的力量消耗殆尽。经济力量也在这样的结构下转变。金融家巩固自身在工业界与商业界——至少在巴黎一所拥有的权力；工人当中则有一小部分开始在人数不断增加的无技术劳工与贫民中取得劳动贵族的特权地位。

应该说直至第二帝国后期，国家机器还基本为少数名流显贵抉择民持，这种情况反映了变化的局限。70 年代以后，包括农民、工人和中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大从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更深刻的程度上参与现代民放政治，普选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生实际作用，更推动了社会精英集团的变化。新的变化的重要标志是在议会中议员的社会出身明显变化。中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者正在取代传统的显贵和土地所有者在议会中居于主导地位，1893 年，88% 的议员是大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出身，1902 年，一些中低级社会阶层人士也得以进入议会，该年议会中有 30 名议员来自工人和农民^①。

在每一个社会发展阶段，都必须有一个统治的精英集团来维系当时的社会，精英集团的演变节律直接反映出时代变化的脉搏。在法国，大革命推翻了贵族的统治之后资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独立地支撑起一个新型的社会，在贵族与资产阶级因不能完全衔接而出现的断裂的时空中，显贵作为新旧阶级交融的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应运而生，显贵就其本质上来说，不像贵族之于土地，资产阶级之于资本主义工商业那样是一个完全根植于某种经济利益的社会阶层，不是一个全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显贵们既来自旧时代的阶层，也来自较为现代的社会群体，它是兼有新旧时代两种取向的结合，这种结合的归集中体现 是它既保留了旧的政客权贵，体现一种传统的延续，又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和社会成员开放，向人人都可能获得的财富和才能开放，反映一种现代的变革。这种社会身分取向上的扩大和拓宽，以及精英集团组成结构上的二元性，显示了精英集团本身发展的弹性，也反映和揭示了新的社会结构未来发展的走向，即向更开放更现代的社会结构演进。表现在社会统治精英的变化上，是在十九世纪后二十年中资产个侧面反映出法国已经完全进资本主义时代。

^① 罗杰·普赖斯：《拿破仑三世和第二帝国》，朴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年，第 158 页。

（二）社会演变的特点

现代社会结构的一个突特征是它的开放性流动性。这种社会结构形成在主会分层方向有诸多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使原来血缘关系和地域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遭到破坏，二是使"在许多前现代社会所见一的那财富、权利和身份关系，在一种颇为严格的等级秩序中结合或分隔的倾向，随着现代化的演进而趋于消失。"也就是说，在传统社会中每个社会阶层各自封闭又与其它社会阶层相互隔离的等级制度也将被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打破。这两种影响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现象，一是造成血缘关系松弛地域界限模糊，社会成员进行水平流动，人口城市就是这种水平流动的集中体现，二是造成了社会成员的垂直流动，即先赋性的-无论是等级的还是地缘的传统身份标准丧失，各社会阶层之间的障碍隔阂被打破，社会成员借助职业的、教育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等到渠道而上下流动，从而出现一种新的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界线模糊的身份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和成员之间的关系，由此建立起新的社会结构的框架。

旧制度下的法国社会结构呈现一种横向堆积的金字塔形。塔的最底层是为数众多的农民、工匠及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第三等级人民大众，其上端从着以国王为首的贵族和僧侣的特权等级，特权等级与第三等级之间的横亘着一道出身不同而造成的天然屏障。由于出身屏障的存在，贵族因出身高贵不必担心地位的跌落，下层人民也无以向上攀援的阶梯。人们对以血统来判断的社会地位的认同高于对经济地位的认同，社会层次分明，社会结构也因之而静止僵化。大革命摧毁了社会阶层之间这道屏障，对社会地位的认同让位于经济地位的认同，社会才出现了流动的可能，但是出现了流动的可能并不意味着已经实现了流动。大革命在打击特权等级的同时，又创造出为数众多的小农，加强了对他们对土地的附着力，从这一角度上看，农村社会分化社会流动的阻力增在。此外，因千百年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社会阶层内部的稳定性不可能一朝丧失，社会成员的分野也不可能被革命一下冲破。更为重要的是新的社会经济没有充分发展，社会经济结构没有本质性变化的历史氛围中，社会不可能给人们，特别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因此至十九世纪中期，社会权力社会财富和社会地位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没有根本性变化，农村社会是这样，城市里也是如此。整个社会结构还保持着传统的特质。

再以全体选民的财产分布为例，1842年前，选民的大多数（约55%）是交纳200至300法郎直接税的小纳税选举人，1/5是300至500法郎的纳税选举人，交纳1000法郎以上的大的纳税选举人仅占8-9%，而纳税最多的超过8000法郎的不足百分之一^①。可见这还是底宽上尖的金字塔形的纳税选举人结构，不过

^① S.N.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张旅平译，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在“大城市中与此相反，大的纳税选举人的比例有很大上升，特别是中小纳税人之间的比差在减少，在巴黎和鲁昂者是如此。”这说明财产分配结构上的变化已经在少数大城市中开始了。

虽然受教育机会职业经历和政治生涯等都可以成为社会成员地位升迁变化的缆绳但在十九世纪前期在人们的参政权还受到财产资格限制的社会里社会成员上下流动，由此岸到彼岸，由这一阶层到另一阶层的主要阶梯还是财富财富已经在民族中激起一种普遍的冲动，成为社会前进的一种动力。“通过劳动与节俭致富”的箴言已成为时代的精神的真实写照。在城市中通过致富而改变个人和家庭的地位已经成为人们主要奋斗目标。1847年“辩论日报”这样写道：“资产阶级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种社会地位，一些人得到它，同时有人失去它。……资产阶级也是一个阶级，其大门向所有人敞开，以便于人们的出入。”^①显然资本主义社会向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变化的机遇。人们对财富的追逐造成这样一种社会后果，一方面贫富差距加大造成新的社会鸿沟，复辟时期巴黎贫富两极之间的差距在10至10000万法郎之间。另一方面中间阶层崛起，中产阶级壮大。这种上下差距国大，底层比例减少，中间阶层增多的变化，造成社会财富占有的总体结构的变形，即由原来的金字塔形变为倒置的陀螺形。这两种结构有本质上的不同，前者表现的是城市中传统社会占有结构的牲，后者绘出的是工商业发展导致社会财富重新分配，中产阶级发展壮大的历史轨迹。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在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异，“在巴黎变化始于1820年，完成于1847年，在波尔多是始于1824年，完成于1869年，在鲁昂是七月王朝变化末期完成，而里昂、里匀、亚眠和图卢兹是1869--1875年完成。”“第二帝国末期在大城市金字塔形已被碾碎，倒陀螺形基本形成。”^②

由于现代经济发展的冲动源于城市，城市能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因而农村中的社会流动更突出地表现为向城市移民，1841-1851年，法国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数字为84.9万，1851-1861年法国工业同涨时期，乡村移民人口达126.5万，直到二十世纪初，农村移民规模再没少于80万，即1841--51年水平。1900年一个村庄里100多农民的儿子有42个留在农村，而100名农民的女儿中仅15个留在农村^③。十九世纪末阿维农地区东北部半数以上已婚妇女去了巴黎。1911年该地五分之四的新婚夫妇去了圣·塞利。与此同时，乡村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为农村人口提供了上下流动即纵向流动的机会和可能。特别是直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农产品价格上涨，遗留在农村的人们因此有了更多的发展机遇。以加莱海峡省为例1851-1911年间，35%的农业工人改善了他们的处境，其中56%

^① D.Charlton, *Positivist Thought in France During the Second Empire, 1852-1870*, Oxford, 1959, p.234.

^② Cochin, *Sa Population, Son Industries*, London, 1977, p.238.

^③ Cochin, *Sa Population, Son Industries*, London, 1977, p.239.

变成了占有土地的农民或农场主，其余的找到了理解 保障收入更高的工作，如园艺工人，道路工人等等^①。1887 年，厄内斯特·拉维兹发表的一本寓言小说，借一位鞋匠之口说出这样的话：“我父亲曾一无所有，我现在有了些钱财，我的孩子如果像我一样努力，他们的财产将两倍三倍于我，我的孙子将成为坤士，人在世界上就是这样升迁的”。这句话表明当时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也可以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从根本上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

当然对农村的社会流动不能做过高的估计，因为十九世纪法国农村中资本主义经济的有限发展，给人们提供的社会流动的机会毕竟有限，1851-1911 年加莱海峡省的耕种者中，79%的人生在原来的社会等级内，10%的人改变现实的可能^②，一些有远见的农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环境，他们让自己的子女接受更多的教育，以便适应城市里的就业机会，从而在更深层次上促进了农村人口的地域流动和社会变动，加速了乡村社会的变化，加速了整个社会的流动。

开放的社会结构造成一种流动的社会机制，这种流动的机制给现代政治民主进程以深刻影响。因为在等级社会中，社会上层既要求下层的服从，又给下层提供某种意义上的“保护”上下层之间存在某种“权利”与“义务”的纽带。诸如封建领主与农奴，手工业师傅与帮工，商人、店主与帮工间都存在这种相依的关系，这种家长式的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存在，致使下层对上层存在一种心理上和观念上的依赖服从，这也是庇护性政治即专制政治存在的社会基础。当社会流动出现后，社会成员的身份发生变化，人们不必永久地居于一地，也不会永远依附于某一个主人，新的经济链条把人与人连接起来，原来上下层之间那种“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解除，家长式的社会关系消失，人人都成为自由的人，这种情况有利于培养和提高社会成员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具有独立意志能充分表达自己意愿的人民面前，万能的行政权力和专制的庇护性的政治制度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社会成员的纵向流动和水平流动，使原来等级的金字塔倒塌，社会结构进行新的组合。在国家权力与人民大众之间出现一个中间阶级，这一中间阶级不是像贵族那样僵化封闭，而是可以变化流动，这就使得它能够不断地把民族精华和时代精英吸引这一维系社会的中坚力量中来，统治精英阶层的这种开放性和流动性，也避免了个别人物和个别集团对整个社会进行专制统治的可能。

^① Cochin, *Sa Population, Son Industries*, London, 1977,p.240.

^② Cochin, *Sa Population, Son Industries*, London, 1977,p.240.

第二章 巴黎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

巴黎如同大海汪洋。测量它，它却深不见底。调查它，报道它！然而就算再怎么谨慎周到，派了再多探险家不断搜寻，巴黎永远都将维持处女地的模样，它就像座人烟罕至的洞穴，潜藏着难得一见的花朵、珍珠，以及前所未见的怪兽——珍奇的事物俯拾皆是，文学钻研者即便身处其中也难窥得全貌。

——巴尔扎克^①

巴尔扎克眼中的巴黎神秘而深邃，仿佛一片深不见底的汪洋大海，不得窥探全貌，第二帝国时期巴黎的巨变搅动了这片大海，埋藏在巴黎深处的物质浮出了表面。探究这些碎片化物质的结构和演化，也许能接近更真实的巴黎。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前，“下层民众”一直是巴黎社会中被忽视的群体，工业革命和城市的现代化进程让我们开始把目光聚焦在这个群体以及他们的生活状况。

第一节 帝国时期巴黎下层民众的住宅问题

第二帝国在住宅供应方面曾经历一场剧烈的转变。资产阶级住宅深受金融、土地开发与建筑新体系的影响，使得巴黎内部逐渐出现住宅的区隔。相应地，为了满足工人阶级住宅的需求而出现的小规模建筑体系，主要分布在巴黎周边的土地上。工人的收入相对较低，他们所能负担的租金价格并不高。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土地与建筑都很昂贵，过高的租金迫使住宅条件令人触目惊心。快速上涨的租金使工人人口的负担加重。早在 1855 年，列昂·赛就指出全巴黎市的房租上涨了两到三成，因此光是一间单人房的租金就不少于 150 法郎。科尔邦认为 1862 年工人阶级的房租比 1848 年之前高出了七成，托马斯则认为第二帝国时期的住宅成本每十年就增加五成。费洛所收集的数据较低，第二帝国时期的涨幅介于 50%—62% 之间，租金在 100 法郎以下的房子几乎是不可能的；1866 年，专供已登记的穷人承租的单人房，平均租金在 100 到 200 法郎之间。从约 4 万个贫穷家庭所支付的租金统计来看，1856 年的平均租金是 113 法郎，到了 1866 年提高到了 141 法郎——虽然市郊并入巴黎后，便宜的郊区住宅也成为统计样本，但价格

^①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第三卷，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年，第 67 页。

仍持续上升^①。人们一致认为，租金的涨幅超过工人名目工资的涨幅，尤其是在1860年代。租金的上涨与房地产的普遍上扬一致，影响了所有阶级。凡是依靠固定所得或甚至萧条的农村房地产租金过活的人，以及只能支付不超过700法郎左右租金的人，尤其觉得日子难过。资产阶级中也可看到许多艰难而被迫搬家的例子。但对那些分享了第二帝国经济利益的人来说，上涨的租金根本不成问题。对于50万名在巴黎以自己的劳力维持生活的人来说，则又是另一回事。

面对这种情况，跟那个人有几种调试方式。我们从许多个人的小故事得知，当时的工人提高了住宅的预算比例。1860年，工人收入中有七分之一花在住宅上，在此之前则只有十分之一，而到了1870年，甚至达到三成。工人也尽可能利用空间。对于只有一间斗室容身的家庭来说（1866年的调差显示，有三分之二的贫穷人家是如此），要与别的家庭共同租用一间房间实在是强人所难，但如果家庭再穷一点，分租一室就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分租一室对单身者来说较为简单，许多出租公寓的确建成像军营一样的形式，每间房间都放满了床，供低薪单身劳工居住。另外，在巴黎周边也能找到低廉的住宅，虽然租金较低，但步行上班的路程却更为遥远。事实上，巴黎周边住宅的投机使得当地租金不如想象的便宜，尤其是市郊的建筑商与房地产业者强烈倾向于从巴黎房地产繁荣中分一杯羹，于是他们便从工人身上赚取利润。最后一个渠道则是住进分布于巴黎周边或甚至接近市中心空旷地带的贫民窟（有时只是暂时的）。

工人的收入与租金相比明显不足，这一点成了巴黎住宅处境不可磨灭的印记。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解决住宅问题的唯一方式就是将工人移往市郊，他的部分著名论点便是基于这段历史而发。卫生委员会抱怨临时设立的贫民窟就位于市中心新建筑的旁边当地的生活条件令人吃惊，但每个人竟都对此视若无睹。接近市中心的出租房屋数量激增且极为拥挤；通风不良，拥挤而疏于维护的出租房屋建成之后几乎马上就变成了贫民窟；而著名的“新增建筑”有些新增建筑隐藏在奥斯曼华丽建筑外观的背后，将内院转变成高获利的工人阶级贫民窟一则是工人收入不足以负担体面住宅下所出现的折价品。奥斯曼的工程未能清除掉巴黎的贫民窟，却在工人收入停滞不前时带动租金全面上涨，因而加速了贫民窟形成的速度，即使是市中心也不例外。拉扎尔从市中心穿越巴黎到达堡垒，他算出其中未受市政府控制的巷弄、庭院、住家与贫民窟不少于269处^②。虽然大部人提供给贫穷家庭的住宅分布在巴黎东部郊区的半圆形地带，特别是集中在东南与东北地区，有些贫穷住宅甚至零散分布在主要由资产阶级居住的西部地带。

如此绝望的住宅环境势必产生一些社会效应，也许更加强了原本一相当坚牢的家庭组成障碍。西蒙与普洛将他们所看到的工人阶级生活的不稳定与杂交，归

^① R.H.Guerand, *Les origines du logement sociale en France*, Paris, 1966, p.112.

^② M.Halbwachs, *Les expropriations et le prix de terrain, 1860-1900*, Paris, 1909, p.73.

咎于高租金与不是当的住宅环境（普洛企图用这种说辞来掩盖他所支付的低工资与此事的关系）。此外，许多证据显示，不适当和不健康的住宅与持续存在（虽已逐渐减少）的疫病有关，如霍乱和伤寒。空间的缺乏迫使大部分的社会生活必须转移到大街上，而烹饪设备的缺乏则使这个趋势更加恶化。人们不得不到咖啡馆与有余兴节目的餐厅吃喝，结果，这些地方成了集体政治骚动与意识形成的中心。

资产阶级改革者深知这种状况并对此感到紧张，皇帝也了解通过“消灭贫穷”巩固工人阶级的支持，对他的统治至关重要，但令人惊讶的是，在他统治期间竟未对此达成任何明显可见的改革。第二共和时期，在天主教改革者的驱策下，通过了管理有害环境的法律，但奥斯曼不是依自己的目的选择性地执行，就是将其视为空文不予理会——18年间，只检查了18%的住宅。一连串“工人之城”建筑计划（大规模的工人阶级住宅，这是受到傅里叶的观念，集体工人阶级住宅法隆斯代尔的启发）开始于1849年，路易·拿破仑捐助了一些基金，但不久这项计划便因保守派的恶意反对而中止，后者认为“工人之城”是社会主义意识的温床，也是潜在的革命炉灶。工人方面也不领情，他们觉得这些住宅比较像是监狱，晚上十点有门禁，里面的生活也受到严密控制。较能为保守右派与左派的蒲鲁东主义所接受的个别住宅提案，产生了许多设计构想（甚至为此在1867年巴黎万国博览会中举办设计竞赛），但却少有行动，到了1870年，低收入住宅的补助方案只完成了63个单位，同时间合作社（皇帝再度慷慨认捐）所建的单位数也不到41个^①。

尽管与皇帝的利益息息相关，但行动还是失败（皇帝个人同时对集体主义式的与个别的住宅都施以资金援助，鼓吹各项文章评论与政府计划，并且负责将英国对这方面的讨论文章翻译成法文），其中有部分原因出在意识形态混乱上。傅里叶（主张集体主义模式）与蒲鲁东（强烈倾向于工人拥有个别房屋的所有权）之间的歧异造成左派分裂。然而一旦对地主的憎恨达到顶点，蒲鲁东的影响也随之水涨船高，因此也无人敢对巴黎公社所主张的土地所有权提出挑战。从天主教右派的勒普莱到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左派，在广泛的共识下，唯一可行的选项便是在私有财产制的架构下解决住宅问题。尽管如此，房屋所有权对工人来说并不可行，除非政府补助。在这点上，政府遭遇强大地主阶级利益的阻挠——政府政治权力的基础越来越仰赖地主阶级——同时也与普通通行的自由市场理念背道而驰，事实上，对某些人如奥斯曼来说，自由市场几乎已成为行动的核心准则。强大的阶级力量加上意识形态的混乱，使所有针对住宅问题所采取的行动陷入困境，同时也让奥斯曼清除贫民窟的计划停顿下来。一直要到巴黎公社之后，改革

^① J.Beecher, Victor, *Considerant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French Romantic Socialism*, Berkeley, 2002, p.98.

者才发现，令人同情的贫民窟才是革命行动的温床，而非“工人之城”，住宅改革这才开始正式上路。

第二节 帝国时期巴黎城下层阶级的妇女状况

根据拿破仑法典表明妇女在法律上被视作未成年人，妇女必须在男权或者某种机构（修道院）的保护和监视下才得以生存。妇女的角色和活动场所被固化在家庭的封闭环境中，上层社会的价值观更是如此，在家庭中勤俭持家、相夫教子，成为“好妻子”的角色才是一个女人该有的形象。可是在第二帝国下层阶级的社会中，妇女的情况显然发生了变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与现代化巴黎都市本身的吸附性吸引着外省大量劳动力的涌入，其中不可缺少的是女性队伍，她们是劳动力的贮备力量。根据资料显示：“1847年至1848年，妇女在整个巴黎的劳动力中占了41.2%，1860年减少到31%，1872年又回升到41.3%。”^①前期数量减少可能主要由于是统计错误的原因，但是总体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进入劳动力市场中，尤其是帝国后期，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妇女低廉的工资水平更为受到企业主的青睐。

第二帝国的劳动妇女工作分布情况如何？她们的工资水平又是怎样的呢？根据杜沃（Duveau）统计的1860年女性的工作情况的表格如下^②：

职业	年收入（法郎）	每日工资率
洗衣妇	685	2.00-2.25
时尚业	640	2.25-3.50
制花业	420	1.50-2.25
技工	387	1.50-2.25
裁缝	340	1.00-2.25

上图显示了1860年巴黎妇女的职业分布情况及工资水平。由此可以看出，洗衣妇是妇女年收入最高的工作，而时尚业虽然年收入次于洗衣业，但是由于工作天数少于前者，它的每日工资率是最高的。尽管如此，和男性相比，同样根据杜沃统计的男性工作情况显示：“1860年男性年收入最少的家具木匠的年收入为700法郎。”^③女性收入最高的行业仍然低于男性收入最低的行业，在劳动力市场

^① Michelet, *La femme*, Paris, 1981, p. 23

^② G. Duveau, *La vie ouvrière en France sous le Second Empire*, Paris, p. 56.

^③ Ibid, p. 55

中显示出性别的不公平。因此,女性想要不仰人鼻息过生活,保持自己的经济独立是否可行呢?答案是非常困难。根据朱尔·西蒙从1861年开始所进行的研究显示,“一位每天在家需要工作12小时的妇女,假定她身体健康,遇到最短的淡季并且领到最慷慨的工资,她的年收入预估可以领到500法郎。扣除基本房租等费用,每天大概剩下59生丁,这钱足以购买一些面包和牛奶这类食物。”^①这已经是最为乐观的预算了,但事实是一位女性的收入根本无法满足她们的生活需求。再考察一下工人阶级妇女的实际生活情况。

第二帝国时期日益增长的劳动负担和不断减少的实际工资压得男性工人喘不过气来,繁重的家庭经济负担使得工人阶级男性的妻子加入广大的劳动力市场,因此妇女不仅要担任传统家庭中相夫教子的角色,还要被迫参与市场竞争赚取微薄的收入,双重的压力加注在工人阶级妻子的身上,使她们不堪重负。由于婚姻成本高,在工人阶级中,姘居的现象司空见惯。除了经济原因,当时的婚姻还是受传统婚姻的制度的桎梏,一般来到巴黎的单身女性的婚姻还是会和她出身地的家庭缔结婚姻。姘居现象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单身女性在异乡渴望家庭庇护的情感以及满足性的需求,许多姘居都不是暂时性的,而是双方长期保持这种关系,虽无婚姻之名,但已有婚姻之实,相当一部分还会怀孕生娃和实际婚姻并无差异。然而,这种现象对女性这方产生很大的隐患。姘居关系缺乏法律的保障,因此一旦男女双方分手,女方无法从男方处获得一笔金钱用来维持自己今后的生活,如果有孩子的话,女方的处境会更为悲惨,抚养孩子的经济压力全部转移到女方一人身上。

单身女性有何出路呢?她们能够仅凭劳动从而获得经济独立吗?有些有技术的妇女主要从事裁缝、缝纫、洗熨妇这些职业,这些从事小本经营的女性手工业者能勉强自给自足,然而当这些女性遇到工作淡季,他们很难仅凭这些微薄的收入来度日。第二帝国时期,在拿破仑奉行“自由主义商业”的政策下,帝国的商业兴旺繁茂,许多诸如“春天”、“便宜”、“漂亮的女园丁”等大型百货公司兴起,左拉称之为“妇女的乐园”。大型百货公司的出现使得传统手工定制的服装业得到了冲击,那些以裁缝或者缝纫为职业的女性生存更为艰难,当然形象颇佳的能够在大型百货商店做服务员,这也为女性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工作形式。

受到教育的女性一般担任家庭教师与学校老师的工作,这些职业的收入同样微薄,女教师的年收入不到400法郎^②。根据前面杜沃所统计的表格来说,女教师的收入水平甚至属于女性整体收入的中下水平,她们维持自己基本的生活都很勉强。某些受聘于资产阶级的女教师会受到雇主的性骚扰,她们被迫生计压力往

^① Jellinek, 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London, 1937, p. 56.

^② G. Duveau, *La vie ouvrière en France sous le Second Empire*, Paris, p. 56.

往屈服于淫威，满足少爷的性需求。

女仆是当时巴黎妇女所从事的最重要的职业。女仆工时很长，住在雇主家里随时待命。雇主提供舒适的居住环境，可靠的安全保障，每日三餐的食物提供，这些都是女仆成为巴黎妇女最受欢迎的职业的原因。虽然，女仆工资微薄，但是却能使得妇女有足够的储蓄，因为平时基本的生活开销由雇主提供；某些女仆还能接受某种程度的教育，提升自身的素质；一些表现成绩优异、忠于职守的女仆最终离开雇主或者退休的时候能从慷慨的雇主那里得到一笔丰厚的退休金；因此，许多从外省乡下来到巴黎的女性首选即是女仆的工作，主要原因是因为雇主提供的住房解决了她们的租房问题（巴黎的房租在第二帝国时期不断攀升，给下层民众带来了极大的经济压力），其次，女仆所得到的微薄的工资可以完全用以储蓄，为以后的嫁妆作一定的物质准备。还有，从女仆的工作中，她们也得到了一定程度关于家务、管理、理财等治家之道方面的训练，为以后出嫁储备家庭管理的技能，对于某些小店铺的老板或者手工业者来说，这些女性不失为理想的伴侣。女仆的职业也存在着安全方面的隐忧，正如上文家庭教师所遭遇的情况一样，女仆同样面临男雇主的威胁。女仆所遭遇的情况甚至更为严重，由于职业技能的缺乏她们并不像家庭教师能较为随意地更替雇主，收入比更为微薄，她们所受到男雇主的控制也更为严重，某些女仆即是男雇主长期的性伴侣，呼之则来挥之即去，若不屈从则会遭到无情的解雇，一旦意外怀孕下场也只有解雇这条出路，要么堕胎要么生下私生子，下场很是凄凉。

从上述对第二帝国时期妇女的职业状况分析中不难看出当时的一位职业妇女想要通过劳动所得获得自给自足的经济独立有相当大的困难。那么她们靠什么来补充收入呢？卖淫和私通则是她们补充收入的来源。

卖淫在第二帝国时期极为普遍。据统计显示“1850年代初巴黎登记有案的有4000名妇女从事这项职业活动。”^①这些妓女在有营业执照的妓院工作，受到政府的控管。然而，其他大部分的妓女是非法的，她们并没有登记入案，长期混迹于巴黎酒馆、歌舞厅招揽顾客。她们的健康状况并没有受到政府有效的监管，因此诸如梅毒等性病在这些妓女中发病率极高，从而传染到嫖客上。法国著名文豪福楼拜曾经给梅毒这词作的解释为“每个人多多少少都被它传染过。”^②文学家波德莱尔的作品很多都以妓女为取材对象，他自身也患有梅毒，他曾有过一句名言：“我们大家的血液里都有共和精神，恰如我们的骨子里都有梅毒，我们都感染了民主和梅毒。”^③法国著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都是妓院的常客，他们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此种疾病，最终也死于此。莫泊桑著名的短篇小说《羊脂球》是以阿德

^① L.Girard, *Nouvelle Histoire de Paris. La deuxième république et le second empire*, Paris, 1981, p.120.

^② Gustave Flaubert, *Le dictionnaire des idées reçues*, Paris, 1911, p.78.

^③ Baudelaire, *Réflexions sur quelques-uns de mes contemporains*, 1861. p. 124.

里安·勒盖（Adrienne Annonciade Legay, 1841-1892）为原型的。莫泊桑在普法战争（1870-1871）中随法军溃败，在鲁昂附近一座被毁的房前邂逅阿德里安，并对她一见倾心，不顾一切地占有了她，事后他心感内疚，后来以阿德里安为原型创作了这篇著名的小说。

左拉小说的《娜娜》作为歌舞剧院的演员，极尽魅惑王孙公子之能事，迫使他们倾家荡产，满足自身骄奢淫逸的生活，最终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

娜娜如今单独留在那里，面孔朝天，被明亮的烛光照着。她如今成了藏尸所里的一具尸体，是一滩脓血，一团被扔在一个枕头上的烂肉脓包已经干瘪，陷了下去，在这堆难看的烂肉上，像土地长了霉，眼耳鼻口都无法辨认。一只左眼已经全部陷在脓包里；另一只，还半睁着，像一个腐烂的黑窟窿。鼻子还在渗着脓液。一块淡红色的硬痂从一边脸颊上剥落下来，正好落到嘴巴里，使嘴巴歪着，变作一个丑恶的笑容。在这具可怕而又滑稽的死亡面具上，美丽的头发，仍然像阳光似的闪闪发亮，仿佛是金色的波涛一泻直下。爱神在腐烂了。看来好像她在阴沟和废置路旁的腐烂尸体上所吸取的毒素，也就是她用来毒害了一大群人的酵素，现在已经升到她的脸庞上，把她的脸也腐烂了。^①

美国传记作家朱利安·奥斯古德·费尔德（Julian Osgood Field）在他的回忆录《我不应该说的话》中说道：“布朗什·昂底尼当然是娜娜的原型，每一个人都知道；而且事实上，左拉本人也这么对我说过；不过他承认，他从来没有见过她，而且对我跟她说的有关她的一切都非常感兴趣。……情况是，布朗什不如娜娜聪明，但她们两人都死于梅毒。”^②材料表明，娜娜就是以真名玛丽·欧内斯丁·昂底尼的女演员布朗什·昂底尼为原型塑造的。这位女演员经常在一些滑稽歌剧里扮演女主人公，赢得观众的喝彩；作为一名被众多有钱嫖客所争夺的妓女，她得到情人们的馈赠，拥有巨额的财富。

妇女之所以卖淫，除了少数高级妓女是为了满足自身骄奢淫逸的生活，大多数还是因为饥饿和贫穷，还有许多妓女来自外省，她们为了逃避外省那种单调、索然无味令人绝望的生活逃到巴黎，然而却深陷在巴黎繁华而又黑暗的泥潭之中。

家庭节育引发棘手的堕胎问题。女仆、情妇与女演员有强烈的动机终止意外怀孕。工人阶级妇女也一样，一方面她们对家庭收入的贡献极为重要，但她们通常也默认丈夫的想法，后者认为“多生一张嘴跟自己抢饭吃，实在毫无意义”。与全国平均出生率相比，巴黎的出生率极低。之后的观察者认为，大规模的堕胎潮到了1850年代就已经出现，往后流传的各种人工流产方法（有些是民俗疗法，有些更有效但却更为危险）则应源自更早的时期。^③在这里，女性再度展现出对自己身体一定程度的控制，这与对家庭的管控相同，而与强烈公共性与政治性的女性主义大异奇趣。

^① 左拉：《娜娜》，郑永慧译，

^② Julian Osgood Field, *Things I Shouldn't Tell*, 1924, p.58.

^③ Louis Bergeron, *Paris: Genèse d'un paysage*, Paris, 1989, p.45

不管法律上是否允许，传统的家庭结构依然存在，并且让女性在这种情况下有各种选择，包括堕胎。资产阶级的婚姻许多纯粹只是投资生意，这种习惯往下扩散到店铺主人与“小商人”，形成独特的恶性效果。至于工人阶级关系则要比资产阶级相行的更为团结。普洛抱怨说，他曾经做过许多尝试，要让工人妻子在阶级斗争时能站在雇主这一边，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酒馆在星期六晚上固定挤满好几个家庭，她们庆祝这个礼拜又占了雇主一些便宜。曾经参与巴黎攻城与巴黎公社的妇女——她们并未如资产阶级通常描述的那样，容易被激怒或者是因愤怒而变得凶残——以非常单纯的传统方式支持她们的男人。另一方面，就女性主义政治在当时成立的女性俱乐部与女性社团的显眼程度来看，女性所主张的已不只是离婚权与工作权，还在于通过集体的生产与消费组织来建立经济基础，从而达到解放女性的目的。参与巴黎公社的妇女队伍包括了缝纫工、裁缝、装订工、洗衣妇、修剪工人与人造花工，这些女性拥有长期支配经济基础的经验，她们跟男性一样，认为自己要的就是集体主义与合作式的政治。^①

如果说第二帝国时期有哪一项主题特别显眼，那么一定是女性对家庭内部空间的控制日益增强，以及女性逐渐在公共生活中被商品化。各阶级性关系与私通关系的货币化与商品化，以及女性在家庭经济与劳动市场中地位的渐形重要，这两者预示了女性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将有重大变化，但这场重大变化却被男性支配的传统法律结构与经济组织所堵塞。

第三节 下层民众的教育状况

工业革命的快速发展，资本阶级迫切要求劳动者掌握机器工业生产所需要的知识文化。因此初等教育受到重视，较快地发展起来。法国发展初等教育颁布的法案：《基佐教育法》（1833年），《费里教育法》（1881年——1882年）。基佐教育法是法国初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步骤，法案颁布后，初等学校和师范学校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这一法案没有提出普及义务教育的思想。法国的中等教育受到拿破仑第一帝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大批由中央政府创办的国立中学与地方政府创办的市立中学纷纷兴起。1852年课程设置出现文、实分科。1865—1866年放弃文、实分科，设为类似德国实科中学的中等给予学校（1891年称为现代中学），重视和维护古典主义传统，为中央集权设置庞大的官僚机构培养文职服务。

第二帝国时期的教育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帝国宗教政策的影响。帝国初期，路易·拿破仑寻求天主教会的支持，增加了宗教花费的支出。“1852年在宗教信仰方面的预算达到了

^① Francois. Loyer, *Paris XIXème siècle: mL' emmeuble et la rue*, Paris, 1985, p.57

4000 万, 1861 年则接近 5000 万。实物形式的支出尤其可观。教会组织受益非浅: 1851 年法国有 4000 名修会会士, 到 1861 年已经增加到了近 18000 名修会会士。”^①可见, 法国政府当局与罗马教廷建立了合作的关系, 在主教选举的过程中, 至少有一半多的人由罗马教皇任命, 那些拥护法国本国教会自主权的主教的职位大幅度的减少。

1850 年 3 月 15 日, 法国当局颁布了国民教育法, 即法卢法案(法卢(Falloux)系当时的教育部长, 狂热的教权派。此提案由他提出而得名)。法卢法案规定了教士和教会教友, 不论男女, 均可担任教育职务, 所有初等学校均归教区教士管理。这样, 就把国民教育的领导权和监督权授予教会, 教会在短时期内就设立了 250 多所中学, 13 所大学。^②大批世俗小学教师被免职。教权派把法国的教育权彻底控制在教会的统治下, 从第二共和国所酝酿的具有世俗性的基本义务教育体系消释了不少。

1858 年 1 月 14 日发生的奥尔西尼炸弹事件成为了第二帝国宗教政策的转折点。意大利民族分子奥尔西尼因为帝国皇帝执政后并未捍卫当初所承诺的帮助意大利民族独立的问题对皇帝进行了刺杀。皇帝确定插手意大利事务。奥尔西尼事件只是导火索, 路易·波拿巴早已盘算着意大利计划, 意大利是他整个欧洲战略中重要的一环。帝国皇帝大力支持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 这引起了其他欧洲列强的恐慌, 尤其是遭到意大利的罗马教廷的指责, 法国国内的天主教舆论也同样地反对皇帝。意大利战争是路易·拿破仑一次巨大的冒险, 它使得国内天主教派、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达到了和解, 他们一起站在了皇帝的对立面, 毫无保留地指责皇帝糟糕的政策, 同时皇帝也丧失了罗马教会的支持, 因为他使得后者失去了对意大利的统治权。皇帝甚至被这些人称作彼拉多^③。于是, 皇帝的思想发生了转变, 在 1863 年的选举中他任命了主张法国教会自主的历史学家维克多·杜律伊(Victor Duruy)执掌教育部。杜律伊于 1867 年 4 月 10 日颁布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杜律伊法, 该法案不遗余力地推动基本义务教育与法国女子教育的发展, 他是首位提出两性平等, 男子和女子都应该同时进行义务教育的教育家。在推行法案的过程中, 杜律伊总是与立法机关冲突不止, 后者总是在预算问题上予以阻挠。法卢法案把学校的教育权控制在教会手中, 教会权力在 1850 年至 1863 年期间达到顶峰。“1850 年宗教学校的男女在校生人数占学生所人数的 15%和 45%, 到了 1863 年上升到 22%和 54%。”^④教会控制下的宗教学校的势力越来越庞大, 天主教的教育得到继续发展。1863 年杜律伊信奉自由主义, 他把教育推向世俗化的方向发展。

一部分的资产阶级认为传授传统的宗教价值有利于家庭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 他们把宗教教育作为控制社会的手段, 传统的宗教教育符合资产阶级传统的价值。然而其他的资产阶级认为传统的宗教教育阻碍了国民接受科学、理性、进步的思想。由于传统教会传授的内容食古不化、落后而保守, 反教权主义反对传统宗教教育中所呈现的反现代性的精神, 教会并

^① 乔治·杜比主编:《法国史》中卷, 吕一民、沈坚等译, 商务印书馆, 2000 年, 第 1083 页。

^② R.Anderson, *Education in France, 1848-1870*, Oxford, 1975,p.67.

^③ 彼拉多是罗马犹太巡抚(公元 26—36 年), 主持对耶稣的审判并下令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④ R.Anderson, *Education in France, 1848-1870*, Oxford, 1975,p.112.

不重视唯物科学的教育，一位天主教会学校的校长曾经在某次演讲中说道：“只学习物质的科学会导向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即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意味着社会会被瓦解。”^①教会对待传授唯物科学的态度非常矛盾，一方面他们知道科学理性的思想已经是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不可能逆势而为。另一方面，他们恐惧当时社会的思潮，害怕从 1848 年孕育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对教会本身产生威胁。19 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共济会也是一股反对教会势力，主张教育应往世俗化方向发展的社会力量，他们主要由金融等大资产阶级组成的秘密组织，他们认为天主教会学校阻碍了学校世俗化的发展，天主教传授的内容不符合维护自身的阶级利益。

第二帝国时期法国的教育还做不到普及，文盲率还是相当高的。到 1872 年不识字的人数达到总数的两成。^②在相当一部分识字的人群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仅仅具有最初步的教育培训，并没有能力学习到一门真正技术的能力。整个民族的教育程度和劳动素质还亟需提高。奥斯曼不舍得在教育体系中花钱，和他投入大型的市政建设巨额的资金相比，教育上的花费简直九牛一毛。奥斯曼主张教育应该仰赖教会学校和私立学校培养人才，他忽视了公立学校的投入，直到杜律伊法案实行公立免费义务教育，情况才有所缓解。公立学校教师的收入也并不可观，年收入约 1500 法郎，勉强糊口过日，而教会教师的收入更为低廉，大约只有 800 法郎。^③

第二帝国教育学校的类型有三大类：由国家创立的公立学校；由民间资本资助的私立学校和由天主教培植的教会学校。巴黎的教育版图分布也与阶级空间分布统一。西部的资产阶级与贵族的住宅区的子女主要在教会学校与私立学校求学，东部及市郊的工人阶级主要在公立学校求学。然而第二帝国的公立学校直到 1863 年后才逐渐增多，在东北部这些市郊学校非常稀少，简直是教育的沙漠。“从 1860 年到 1864 年，奥斯曼在郊区设立新学校，所花的经费只有 400 万法郎，相比较新区市政厅花了 4800 万法郎，铺设新道路花了 6900 万法郎，修筑新教堂则花了 550 万法郎。”^④以上的例子可见奥斯曼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太过吝啬，公立教育体系的建立并不完全。在杜律伊推行免费公立义务教育之前，工人阶级很少把自己的子女送去学校读书，一方面公立学校数量较少，另一方面当时在公立学校进行初级教育是需要一定的花费，然而工人阶级负担不起这笔教育费，1863 年情况有所好转。总体来说，工人阶级的就学率相当低，教育资源还是倾向于上层社会。

第二帝国时期，原本传统的“学徒制度”陷入了重大的危机。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行业中学徒制度分崩离析，这类行业由于竞争的压力以及工作内容的零碎化，资本家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更倾向于雇佣廉价的童工。工人工作地点与住宅地点距离的分离也使得传统的学徒制的关系日趋紧张，只有少数技术含量要求颇高的诸如珠宝业，学徒制度依然牢不可摧。因

^① Theodore Zeldin, *A history of French passions*, vol.2, Newton, 1975, p.112.

^② R.Anderson, *Education in France, 1848-1870*, Oxford, 1975, p.113.

^③ Ibid. p.120.

^④ 大卫·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黄煜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215 页。

此，新的培养工人阶级劳动技能的教育机构应运而生，取代了传统的学徒制度。雇主也希望通过这些教育机构来对工人进行职业训练和培训。1860 年代某些少数的民间教育机构发展起来了，对培养工人的专业技能起到了一定的成果，为当时的资本企业输送了一定具有专业技能的工人。可是，只有小资产阶级或殷实的工人子弟才有时间或金钱进入这些机构进行培训，那些普通的工人阶级的子女仍然为了生计奔波忙碌，根本没有闲钱和精力送自己的子女去学校接受教育。

工人阶级的教育一般还是在家中进行的，和资产阶级家庭一样，女性在家庭教育中起着最为关键的角色。儿童教育还是以母亲为主导，如何提高女性本身的教育水平，成为法国近代教育界越来越关注的问题。

第四节 巴黎下层民众的公共卫生

19 世纪的巴黎是其历史上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各方面变化最大的时期。巴黎以“世界女王”之姿登上了西方城市的主舞台。伴随着法国工业化程度的加剧，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自由劳动力涌入城市，巴黎的情况尤其严重。城市人口的激增产生了许多负面的效果：城市的各项基础设施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环境恶化，污染严重。受低工资和工作及生活环境恶劣的影响，人们生活困苦，贫富差距拉大，新的社会分层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中产生。其中最为棘手的问题是诸如风疹和霍乱的流行病的产生，这些疾病在人口稠密区肆虐横行，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法国大革命在世界政治领域具有很大的影响，革命的余威延续着，法国政治仍然动荡，19 世纪上半叶政府已经六次易主。法国 1830 年发生的七月革命以及 1840 年的二月革命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政治觉悟，许多社会基础的矛盾和问题也浮出了表面。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路易·波拿巴——这个拿破仑思想的继承者——登上了历史舞台，建立了第二帝国。

为了解决上文所提到的巴黎所呈现越来越多的城市问题，拿破仑决定重新改造巴黎，扩大城市空间，改造生活环境。“巴黎改造计划”在奥斯曼的带领下立即启动。从 1852 年至 1870 年进行轰轰烈烈的“巴黎改造”运动是拿破仑社会主义思想的物质实践吗？一方面，政府做出许多努力来改善城市的环境，避免了市民许多健康问题的产生。另一方面，政府力求给巴黎市民一个安全干净的住房条件，可最终是以隔离穷人区和富人区的形式来实现的。最后，政府大力建造铁路、公路等交通设施，想为市民的出行带来便利，然而也许加剧了社会的分离。

在第一部分，我们将会考查在拿破仑政权前的巴黎社会的公共卫生情况，尤其是起义时期以及诸如霍乱这些流行病的情况，然后试图找出帝政时期政府采取

了哪些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第二部分，我们将研究住房和城市交通情况，看看这些大型的市政工程是如何加剧社会阶级分裂的。

（一）公共卫生

在本章我们将探究拿破仑三世上台执政前 19 世纪初的时期状况。在这个时期，法国大革命产生的社会影响仍然显著，一个新的因素——霍乱席卷了整个巴黎，并且打乱了社会之间原有的张力关系。我们将在文中分析拿破仑政府是如何采取措施来解决相应的问题。

法国大革命的余威仍然在 19 世纪初的法国延续着，巴黎经常爆发冲突和骚乱，穷人阶级发现他们的经济状况很糟糕。两件重要的大事必须记得：1830 年的七月革命以及 1848 年的二月革命。从医学的角度，另外两件重大事件也必须牢记：1832 以及 1849 爆发的霍乱流行疾病。虽然后者与前者相隔一到两年，但是当时社会的公众理论已经把两者联系到了一起。为了更好地理解拿破仑三世的帝国政府的公共政策，所以有必要研究这一理论和其影响。

虽然霍乱并不仅发生在巴黎，但是它所造成的危害比法国其他城市严重得多，因此遭受到了大众舆论的挞伐。“有时候，只有巴黎这座‘革命之城，政治风暴中心，罪恶之城’才适合发生一场神秘的流行病。”^①与此对照，今天，魁北克人批评蒙特利尔不是一个适宜居住的城市，因为那里的北部地区经常爆发暴乱，城市环境肮脏不堪，随处可见鸡窝。事实上，当时的巴黎也是破败不堪，“巴黎的居民……蜗居在黑暗、潮湿、令人恶心的陋室”^②，狭窄的街道，没有街灯，没有自来水，巴黎的生活环境的确恶劣，不宜居住。

当时，卫生学——一个贵族知识分子所创立的新的学科——开始关注人们的生活环境和健康问题。“卫生学家已经建立了把人口密度、肮脏的环境以及贫穷和高死亡率联系起来的方法和理论的框架。”^③

1832 年霍乱的第一批受害者基本都是穷人阶级。自那以后，大众舆论总是时不时地直接指责穷人的生活方式是导致霍乱发生的原因，卫生学家是首批怀疑论者。甚至当时的政府也相信这个理论，《全球观察》报记载：

“我们不断重复以前已经说过的，霍乱通常发生在居住环境脏乱地区的人群身上，以他们的职业来说，他们更易暴露在恶劣多变天气条件下。”^④

于是，公众的关注点转向了穷人。这部份的人群早已在法国各场政治革命中千疮百孔，苦不堪言，有些人听信了“霍乱的爆发其实是一场针对下层

^① Catherine Kudlick, *Disease, public health, and urban social relations : perceptions of cholera and the Paris environment, 1830-1850*. Californie, Berkeley, 1988, p. 162.

^② André Castelot, *Napoléon III*, volume IV. Paris, Rombaldi, 1975-1976, p. 42

^③ Kudlick, *loc cit.* p. 174-175

^④ Kudlick, *loc cit.* p. 177

阶级投毒的阴谋的谣言，”^①立即向当局发难。另一些人相信政府会颁布把他们从大马路上赶走的政策。^②因此，下层阶级与社会的冲突加剧，巴黎城区内各种暴乱频繁发生。

总之，暴力、疾病，不卫生“已经成为了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的综合印象。他们是一个贫穷和堕落的隐藏世界活生生的例子，通过霍乱第一次清晰地展现在上层阶级面前。”^③事实上，富裕阶层的某些人也在数周后感染了霍乱，这个事实并没有改变公众对下层社会的看法。克德利克（Kudlich）这一现象称为“强大的集体记忆”（powerful collective memory）。^④卫生问题成为了大众领域最为关注的问题。

路易·波拿巴自从1851年发动政变后成为了法兰西第三帝国的皇帝。1853年他任命奥斯曼为塞纳省得省长并且负责巴黎的改造工程，协调所有的一切并且向皇帝汇报工程的进度。^⑤在下面的本章中，我们将证明某些工程的一部分，尤其和卫生系统相关方面的工程，是否应该归因于拿破仑三世或者是否省长奥斯曼值得信任。

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经过一系列霍乱流行病的肆虐，卫生问题已经引起了大众足够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贫穷、拥挤、肮脏这些社会不平衡现象，频发的暴乱冲突也唤醒了大众的公共卫生意识。为了更好地了解情况，在工程开始前我们考察一下行政机构和制度。

当时巴黎并没有水务局。“饮用水是通过私人企业进入每户家庭的，过滤与否并不可知”。^⑥当时，巴黎全城只“94个公共喷泉和14个商业喷泉。”^⑦“城市的下水道系统只有170公里。”^⑧关于1830年至1848年期间的医院数据，“1853年的巴黎只有14家医院，其中最为现代化的医院名叫‘拉利伯瓦斯埃勒’（Lariboisière），是在路易·菲利普执政时期建造的。”^⑨这对于巴黎这座“面积有708平方公里，居民有180多万”^⑩的城市实在是杯水车薪。

人们不禁提问在巴黎建造这类大型的卫生工程能够保持公众秩序，或者仅仅为了市民的福祉吗？一方面，卡斯特罗（Castelot）认为“奥斯曼对于健

^① Kudlick, *loc cit.* p. 194

^② *Ibid.*

^③ Kudlick, *loc cit.* p. 195

^④ Kudlick, *loc cit.* p. 167

^⑤ Gertrude Dordor, Sylvie Dannaud, « Les grands projets de Napoléon III et d'Haussmann ». *Historia*, no. 756 (décembre 2009) p. 40

^⑥ Castelot, *loc cit.* p. 52

^⑦ *Ibid.* p. 52

^⑧ *Ibid.* P. 53

^⑨ Nicolas Chaudun, *Haussmann au crible*, Paris, Éditions des Syrtes, 2000, p. 150

^⑩ Castelot *loc cit.* p. 47

康问题尤为关心，认为这是关系到城市居民的福祉问题。”^①肖敦（Chaudun）引用左拉的话语：“政府清洁城市不是为了穷人。”^②因为就如本文前面提到的，整治不卫生的地区只是为了把穷人从这座城市赶出去。

随着下水道、饮用水和医院等大型工程一批批建造起来，这些线索有理由让人们相信打造一个更好的卫生环境是政府的初衷。“奥斯曼似乎有洁癖，毫无疑问来源于他体弱多病的童年。”^③昂立·马莱（Henri Malet）提到奥斯曼“认为满足公众的公共用水是文明到达一定程度的产物，”^④者当然是与古罗马作对照。当然不应该忘记“卫生系统是奥斯曼时代民众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⑤

拿破仑三世为“首都的穷人创立了家庭治疗服务机构”^⑥，这项服务是免费的。^⑦他同样致力于改善住房条件，提供的住房带有“浴室和洗衣池以及一间小小的门诊室。”^⑧在拿破仑的城市改造计划中，“他打算在市郊长期配备这些卫生设施，仅仅在市中心保留医院。”^⑨但是在关于新的教会医院的建立的问题中拿破仑和奥斯曼产生了分歧，“皇帝坚持要把医院布满全城就如同中世纪时候一样，”^⑩他认为具有象征意义。“这个决定引起了卫生学家和市政官员的指责，奥斯曼首当其冲。”^⑪但是奥斯曼最终屈服了，并把新的教会医院布满了整个市中心。

实际上，皇帝的老婆欧歇妮（Eugénie）一开始并不关心公共卫生问题。“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她更关注社会慈善事业。她要求增加儿童医院的床位……她安排在圣·玛格丽特（Saint Marguerite）医院多增加量了 425 张床位。”^⑫“当人们盘点 1833 年霍乱时期医院的床位时，发现仅在圣·丹尼斯（Saint Dennis）市郊只有 587 张。”^⑬人们明白增加床位数是非常必要的。还有，作为皇帝的枕边人，并不太敢认为在公共卫生问题上，她对皇帝产生很大的影响。在拿破仑帝国执政时期，政府颁布了很多旨在解决巴黎民众健康问题的法令。但是很多法令是由奥斯曼和皇后的名义颁布的，让我们很难把这种功绩归于皇帝一个人。所有这一切也是符合当时人们关于卫生问题的整个想法

^① « près de six cent kilomètres » d'égouts et l'installation de l'eau courante; Castelot loc cit. p. 53

^② Chaudun, loc cit. p. 142

^③ Chaudun, loc cit. p. 75

^④ Henri Malet, Le Baron Haussmann et la rénovation de Paris. Paris, Les Éditions municipales, 1973, p. 261

^⑤ Chaudun, loc cit. p. 76

^⑥ Castelot, loc cit. p. 60

^⑦ Chaudun, loc cit. p. 150

^⑧ Chaudun, loc cit. p. 147-148

^⑨ Chaudun, loc cit. p. 150

^⑩ Ibid.

^⑪ Ibid.

^⑫ Malet, loc cit. p. 276

^⑬ Kudlick, loc cit. p. 176

和心态的。从这种角度来说,巴黎改造运动至少从意愿上来说,并不能体现路易·波拿巴的社会主义思想。

(二) 社会阶级

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以及霍乱这些流行病把穷人阶级推上了历史舞台,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明显。拿破仑三世以贫困出名,这意味着这位皇帝比较关注穷人阶级,在本章的第二部分我们将会分析巴黎改造运动中什么部分能够证明皇帝的思想。我们首先将会探讨住房方面,随后是城市交通方面,同时我们也会追寻工程后面的真实意图。

19 世纪上半叶巴黎大概有 200 万左右的居民。随后频发的霍乱流行病让卫生学家把环境的不卫生和生病联系在一起。工业革命时代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工人,自从法国大革命后他们与富裕阶级相对,属于穷人阶级。在这种背景下,拿破仑认为应该考虑给他们提供合适的住房。

17 世纪的住房属于特权阶级,“店主住在底层或者中二楼(底层与二楼之间),房东住在二楼(贵族一般都住在此层),房客住在三楼,仆人住在顶楼。”^①拿破仑三世认为保障房东的权利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所以“他让全城的市民能够随心所欲地处理自己的财产、收入、劳动成果和他们的企业。”^②他希望能“提供“配有家具的住房或者毛坯房,针对工人阶级的年轻夫妇和单身人士,”^③他拆除了一些旧区,为了建造新的区域。因此“3 万座房屋被摧毁,随后 4 万 2 千余座房屋被建立了起来。”^④虽然本意是好的,但是结果并不如预期。

当大量的租房被拆毁的时候,巴黎居民势必要寻找新的住所。但是房子不可能一天建成。受巴黎改造运动影响的市民被迫暂时迁离城市,等到他们回来的时候,发现“新的房东不愿意把房子租给卑微的手工业者,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工人犹如吵闹的儿童,被无差别地归入‘危险阶级’。”^⑤“环境脏乱、租金便宜的住房”比不上“环境舒适,租金较为昂贵的住房”受欢迎^⑥。巴黎的工人阶级最终大都住在由国家提供的廉租房里。这种地理上的隔绝把巴黎整个城市划分成西部“美丽的富人区”以及东部“工人陋室区”。^⑦

这种“地理的隔绝”显而易见是由城市改造运动造成的。拿破仑三世最初的意图是为了把巴黎塑造成世人眼里的美丽之都而打算把工人迁移出城市吗?奥

^① Chaudun, loc cit. p. 141

^② Éric Anceau. Napoléon III : un Saint-Simon à cheval. Paris, Tallandier, 2008, p. 262

^③ Chaudun, loc cit. p. 147

^④ Dordor et Dannaud, loc cit. p. 40

^⑤ Chaudun, loc cit. p. 142

^⑥ Ibid.

^⑦ Chaudun. loc cit. P. 143

斯曼认为“必须抵制从外省日益涌入巴黎过多的工人阶级。”^①关于这点，皇帝完全赞同，并没有其他的意见。拿破仑渴望把巴黎打造成“第二帝国的窗口，世界性的首都。”^②然而昂苏（Anceau）认为“提高穷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是皇帝最关心的社会问题之一。”^③他认为“他关心下层阶级的形象并不是他精心策划为了吸引共和政体的拥护者的计谋，因为后者的大部分都是自有资产阶级，并不关心工人的生活疾苦，也不是为了吸引大众的手段。”^④然而谁相信呢？

最初社会主义的承诺与最终的结果显然有很大的差距。相对于巴黎革新的工程，人们更在乎住房问题。很难鉴定拿破仑三世的举措是否合乎社会主义者的思想，那就必须从其他方面去分析，例如公共交通。

19 世纪初离开巴黎外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几个世纪以来，巴黎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必然需要扩建大量的基础设施，例如公路、桥和铁路等来使得人们的出行变得更为便利。与住房政策对比，道路的工程同样加深了社会的划分。

巴黎老式狭窄的马路的规划相当随意，马路整体的格局杂乱无章。^⑤桥梁是需要收费的，铁路无法通向巴黎市中心，当然也无法覆盖整个法国。拿破仑认为“整个巴黎必须适应新的经济。”^⑥所以，对于巴黎人民的出行问题以及巴黎与法国外省联结交通问题也成为了帝国政府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事情。

拿破仑认为“与其拓宽陈旧的马路，还不如建造新的道路：因此 70 条新的道路开始挖工开凿。”^⑦虽然不断扩大到道路空间使得交通更为便利，但是一些人仍然对此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如今，大炮仿佛自由地操纵着不断扩大的战场。”^⑧不得不回忆起 19 世纪初发生在巴黎的暴乱，狭窄的街道极为容易被民众设置路障封闭，如同“堡垒”。所以，“看上去很有必要计划地在某些地方建立坚固的营房，营房之间通过平时可使用的道路连接。在某个既定是时间，这种道路策略可保证上级命令的正确的传达。”^⑨

这种城市交通的规划并没有改善社会阶级的隔离。今天，住在城市郊区的人们很容易去市中心工作。但是，在拿破仑三世的眼中，交通的建设似乎仅仅是为了诸如通商需要这些经济原因。为工人阶级无法负担市中心高昂的房价，只得被迫迁移到市郊，道路的建设反而使得工人出入城市更为便利，同时也使得帝国首

^① Chaudun, loc cit. p. 145

^② Chaudun, loc cit. p. 146

^③ Anceau, loc cit. p. 257

^④ Anceau, loc cit. p. 258

^⑤ Pierre Pinon, « Les conceptions urbaines au milieu du XIXe siècle ». Des Cars, Jean. Paris-Haussmann : le pari d'Hausmann. Paris : Pavillon de l'Arsenal, Picard, 1991, p. 48

^⑥ Anceau, loc cit. p. 266

^⑦ Dordor et Dannaud, loc cit. p. 39-40

^⑧ Chaudun, loc cit. p. 154

^⑨ Ibid.

都摆脱了那些潜在的“危险阶级”。

在分析巴黎改造运动中的过程中，我们很明显地发现帝国政府所做的一切措施并没有关于穷人阶级的福祉。公共安全和经济是政府首先考虑的部分。虽然从以后工人的住房条件得到了极大地改善，他们住在如今我们称之为廉租房（HLM）地方。但是在拿破仑三世时期完全没有一点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化的实现。

第五节 巴黎下层民众的日常交往生活

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街道上百货商店林立，这些“商业性的教堂”成为了许多人崇拜追逐的对象。这时的巴黎是个名副其实的“享乐之都”，上层社会的社交纽带就是著名的“沙龙”。沙龙起源于17世纪，由贵族女性为主导，社会名流所参加的聚会，聚会会围绕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进行讨论与批评。文艺青年想要在巴黎崭露头角，“沙龙”是他们不可或缺的途径，每天在沙龙耗上五六个小时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沙龙兴盛于17、18世纪，但到19世纪沙龙的发展式微了，期间原因众说风云^①笔者认为这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法国大革命至19世纪动荡的政治使得贵族已经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荣耀，“沙龙”代表旧时“宫廷”控制下的自主机构受到了资产阶级的冲击。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快节奏的效率和生活方式与贵族“闲适、矫揉造作”的生活风尚越来越格格不入。还有沙龙曾经作为上层社会信息交流、传递的媒介场所逐渐被兴起的报纸、出版社等现代大众传播媒介所取代，沙龙的“交往”作用被消解了一部分，这也是它衰落的原因之一。当然，法国的“沙龙传统”不会轻易丢失的，此时的沙龙呈现出专业化的方向。例如格勒菲勒伯爵夫人的沙龙主要讨论音乐领域的最新动态，卢瓦内夫人的沙龙更为关注入选“法兰西学院”的贤士。沙龙虽然没落了，但是一种新型的“咖啡馆”文化正在不断兴起。

相较于“沙龙”的拘束和矫柔造作，咖啡馆的氛围就轻松和自由多了。“沙龙”是上层阶级的公共交往空间，它封闭的形式显示了它的阶级性，参加沙龙的对象都是上流人士，而下层阶级的民众是被“沙龙”世界拒之门外的。19世纪法国社会阶层分层与旧制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王权和贵族的式微，资产阶级与下层民众的兴起导致了沙龙逐渐失宠，而为各个社会阶层服务的“咖啡馆”成为了巴黎人民的“公共沙龙”。

“在法国，无论他的职业、性别、年龄都喜欢在咖啡馆消磨时光。咖啡馆也打乱了农民传统的劳作时间，生活中自从有了咖啡馆，农民的休闲时光大都在此度过。人们去咖啡馆的目的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和朋友见面；有的是为了与志同道合的朋友谈政论道，针砭时弊；有的纯粹为了消磨时光打打小游戏，还有某些单身汉只是为了节省开支，蹭着咖啡店的水、电以及免费的报纸。”^②

咖啡馆改变了法国人民的生活方式，下层民众也不例外。“歌舞咖啡馆”是

^① 哈贝马斯认为沙龙作为宫廷的公共领域在19世纪被资产阶级瓦解了，参考：哈贝马斯：曹卫东、王晓珏、刘北成、宋伟杰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5-36页。兰德斯则认为法国大革命改变了沙龙赖以生存的土壤，终结了沙龙的命运。参考Joan B. Landes, *Wome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古的曼针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到了19世纪，沙龙由一位女人所主导的形式变得越来越不受控制。参考Dena Goodman,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Ithaca, N.Y. 1994.

^② Christophe Lafébre, *La France des cafés et histoire*, PRIVAT, 2000, p.16.

流行于第二帝国时期重要的娱乐场所。这类咖啡馆的布置很有意思：底层的包厢是为贵族等上流人士准备的，二楼的阳台则是给资产阶级准备的，三楼是小店主等，四楼则是留给工人等下层的平民，俗称“鸡窝”。^①由此可见，这种布置形式体现了咖啡馆面向各个阶层的特性。更为有趣的是控制整个咖啡馆的恰恰是那些来自“鸡窝”的平民，所有的掌声、口哨声、起哄声都来自他们，他们语言粗鄙、下流，整个咖啡馆就像是个菜市场，闹哄哄的。巴黎社会各个阶层莫名地在这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融合。当然不可避免这个场所被某些体面人士所呵斥，认为出入这种场所是种自甘堕落的行为。歌舞咖啡馆娱乐形式丰富，任何寻欢作乐的方式都可以在这里得到体现。有一种“角色扮演”的游戏相当受欢迎。在这里，每个人隐藏自己的身份和阶级，扮演着另一个比自己或高或低的身份，工人阶级伪装成资产阶级，贵族装扮成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摇身一变可能变成工人阶级。每个人妆模作样地在巴黎的午夜扮演着不同的自己，这种混淆身份的游戏满足了人们某种逃避现实的心理，从身心上取得短暂的放松与愉悦。这种场景司空见惯：“印花布们”^②同“达官显贵”临桌而坐，他们穿着最好的西装，小心谨慎地喝着酒，生怕溅到西装上。

咖啡馆作为下层民众的日常交往的场所，除了维持共同阶级的情感的交流外，也在工人阶级形成自己政治观点重要的地方。各种革命中形成的政治思潮在咖啡馆和酒店发表，传播，流传，这位以后“巴黎公社”中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巴尔扎克说过：“咖啡馆就是人民议会。”^③可见，咖啡馆和民众的政治生活联结有多紧密。咖啡馆的报纸可以随处翻阅，当日的头条即是民众争相热议的对象。在这里，人们可以随意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不同的政治派别难免争得面红耳赤。咖啡馆聚集着很多反对政府的反对党，他们竭力地表达对政府的不表，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这里各种思想的碰撞产生出了许多革命的火花。因此每个咖啡馆都会有固定的访客，他们拥有着相同的政治主张和看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莫默斯咖啡馆（café Momus），这家咖啡馆坐落在雷特尔——圣日耳曼——乐克塞路瓦路上，位于阿布尔——赛科路和罗浮路之间，在这能看到“第二帝国”的胜景。这是一个被自由思想和自由生活包围的地方，处在城市的商业中心。小说家亨利·穆尔热（Henry Murger）或和他的朋友在这里的吸烟室接待来访者，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地将中产阶级顾客赶出去。穆尔热在他所写的《波西米亚生活场景》一书中将在莫默斯咖啡馆的生活神化，在他的描绘

^① Zoa, *NaNa*, Hachette, 1878, p. 45.

^② “印花布”是由资本产生的某个特定阶层的代名词：包括会计师、职员、掮客、收银员、下层官员、银行柜员、保险代理人、旅行推销员、售货员等；很快又增添了速记员、报务员、速记员、小学教师、广告商，史学家把这一阶层称为“低等白领阶层”[Delotel, *Aux origines de la Commune: le mouvement des réunions publiques à Paris, 1868-1870*, Paris, 1980, p. 59]

^③ www.barreau.qc.ca/journal/vol34.no14/etymologie.html.

下,《波西米亚的生活场景》是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它激动人心、充满智慧、崇尚自由生活。咖啡馆和它的顾客们就是一种反抗标志,反抗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自我满足的精神特质,这种特征随着奥斯曼计划的进行,似乎在重建巴黎的过程中找到了具体的表现。莫默斯咖啡馆的生活与帝国王朝的习俗和标砖截然不同,后者希望回到拿破仑一世的光辉时期,但实际上却埋葬在自己荒平庸的野心之下。

“小酒馆”也是下层民众联结情感与信息的重要纽带,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随着城市改造运动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许多大量的移民移入了巴黎,这些移民来到陌生的城市,形成以自己出身地为单位的小聚落,小酒馆成为了他们联系的重要场所。“小酒馆”中有一种歌手小酒馆,它比歌舞咖啡馆更高一个层次,可以表演短剧、歌唱、朗诵诗歌等,它把高雅文化与民俗文化结合起来,这在当时一度成为了风尚,大众趋之若鹜,门庭若市。

第四章 巴黎下层社会与上层社会的矛盾与割裂

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面临社会转型的问题,在这个时期,民众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因此各种社会矛盾加剧。新旧观念的冲突引发了各种社会思潮的产生。经济结构的转化加大了贫富差距的程度。艺术领域也是百花齐放,印象派画家以及象征主义文学家把创作题材的对象焦距在下层阶级,以此表达他们对资产阶级理性、进步的价值观和平庸的艺术审美的反抗。

第一节 社会分裂的根源

在19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法国是政治最不稳定的国家。自法国大革命以后,法国政局动荡,各种思潮重生。拿破仑建立的法兰西第一帝国,路易菲利普的七月王朝,1848年的革命,第二共和国等,法兰西的政权交替极为频繁,尽管他们本身都希望国家稳定。随着资产阶级逐渐掌握政权,要求政治稳定的呼声日渐高涨,在保护大革命胜利果实的同时,社会要求寻求秩序和进步。但是造成19世纪法国政局动荡不堪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要的原因应该是贵族与资产阶级相互博弈是造成法国政治社会长期动荡的原因。基佐曾经对此有过评论：“双方都是为了专制制度或者贵族以及资产阶级自己的利益辩护，根本不是为了团结，而是为了为专制制度辩护，或为了建立和实施自由贵族和资产阶级始终处于分离状态，他们只会彼此倾轧或排斥，一方不肯接受对方的有点，另一方也不会包容对方的不足。^①资产阶级在崛起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占有社会优质的资源，得到社会进步力量的支持是必然的趋势，在这过程中，法国贵族的劣势被资产阶级削弱，然而贵族肯定心有不甘，眼看着自身的优势和利益不断受到资产阶级的威胁。结果，双方的不妥协，互相排斥并没有改善彼此的政治环境，反而双方共同承担不理智的后果，双方都陷入了动荡的政治环境中。

第二个原因应该归咎于法国的农民。法国是个农业大国，尽管第二帝国时期工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但从长期来看，法国的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农民也是这个国家不能忽视的群体。法国农村历来是教皇、教权控制的地区。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贵族被资产阶级推翻，罗马教皇的势力不断削弱，尤其是拿破仑第一帝国时期。天主教所传授的神学思想与资产阶级要求的自由理性进步的思维背道而驰，因此，资产阶级与天主教之间有着微妙的矛盾。然而，对于法国的农村，他们历来被资产阶级排斥在外，哪怕是法国大革命发生以后，资产阶级革命的果实并没有惠及广大的农村地区，这部分仍然被保守的宗教势力所操控，资产阶级的果实无法渗入农村地区。贵族与资产阶级互相不妥协，1824年在查理十世上台后，贵族非但没有收敛，政治上更为反动。因此，贵族与资产阶级在权力上分享失败。结果，贵族与农民微妙地站在统一战线，与资产阶级站在了对立面。根据巴林顿·摩尔的说法：农民在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中非但没有捞到好处，反而在资本主义持续的发展中，农民的产权受到了削弱，在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农民反而处于弱势的位置。另外，农民这个群体并不关心社会政治的民主化。^②可见由于农民长期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他们并不关心社会的政治动向，更关心与自身利益更为相关的经济利益，由于其自身的经济利益与资产阶级有着固有的对立关系，因此农民这个群体有着天然的反资本主义倾向。

还有个原因是法国的上层阶级，包括贵族与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忽视和剥削。自法国大革命后，工人阶级不再是历史上无声的群体，他们在政治上的诉求和发声越来越响亮，他们在法国社会中承担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法国上层社会忽视了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的诉求，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这类群体自身的利益不断受到损害以及打压，因此这也是造成19世纪下半叶法国社会动荡

^① M. Guizot,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de la France*, Librairie Académique, Paris, 1859, pp. iv-v.

^② 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897年，第85页。

不已的一个重要原因。托克维尔在阐述 1830 年后法国资产阶级时评论道：“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由于利己主义只囿于自己眼前的权力，他们只满足于自己的私利，经常摆出一副经营私营实业的做派，因为资产阶级内部每个人个人的微小的利益就把大众抛之脑后。”1848 年二月革命爆发的前夕，他在众议院发表的演说中对资产阶级提出如此的警告：“最近社会世风日下，动荡不安的局面也许会在短期内把你们引向新的革命……看在上帝的份上，改变下思想吧，因为这类传统的思想会把你们引向深渊。”^①

造成法国社会政治动荡并不可避免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法国具有革命的传统。法国一旦遇到政治障碍，有关的利益群体缺乏妥协的思想，一定会考虑诉诸暴力或者革命。法国的革命无法离开暴力，暴力仿佛是革命必然的组成部分。暴力已然变成了政治诉求必然的手段，而且也许不仅仅是手段，更是一种战略。如果某个群体想要转变大众的思想，暴力革命是他们首先得方法，甚至带有“某种教悔”的性质。里昂的工人团体曾经在宣言中呼吁道：“人民啊！什么时候你们土地再次被你们的鲜血所浇灌呢？1793 年的亡魂会醒过来欢饮这令人激动不已的宴席^②”这种对于革命热衷狂欢的思潮在法国是相当普遍的，这和法国这个国家缺乏和平解决矛盾冲突的手段是无法割裂开来的。频繁发生的暴力是这个社会病态化的常态。

自从法国大革命伊始，法国社会在探索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过程中，经历了多种尝试，然而最终并没有形成一种稳定的政治形式。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的政治制度保证了英国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政治稳定，议会是君主立宪制的基石，它保证了英国政治制度的稳定，然而法国从 19 世纪开始，就见证了四种不同的政体，在不断地尝试和失败中，法国始终未找到一条成功的道路，和平解决政治冲突变得希望渺茫，每次的失败也没有给法国带来教训。

第二节 社会思潮的冲突

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社会充斥着多重矛盾。各种社会政治体制纷纷登场。资产阶级与贵族等封建残余的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还有无产阶级与两者共同的矛盾，所有这些盘根交错，每个阶级还分裂成不同的利益集团。

^① 托克维尔：《回忆录：1848 年法国革命》，周炽堪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47、54 页。

^② 乔治·莫朗热：《七月王朝时期的共产主义思想》，雷永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 21 页。

相应的情况是不同的份子所信奉的意识形态也不尽相同。

保皇派被分裂为波旁派 (bourbonistes)、波拿巴派 (bonapartistes)以及奥尔良派 (oréalistes)。波旁派是最传统的保守势力,他们主要是由贵族组成。而波拿巴派并不反对资产阶级也不反对革命,他是通过资产阶级的革命才登上历史舞台的。但是这个阶层主要符合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它们与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与冲突也极为深刻,1848年的革命的爆发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下层民众也不是利益一致的,工人阶级与农民都受到上层阶级的剥削,但是他们在宗教和政治制度的选择上并没有合作的迹象。

第二帝国时期的贵族经历了最初大革命带来的紧张感后,他们的反应可谓多种多样,真正的正统派毫无掩饰他们对厌恶的共和国倒台的快乐之情。他们仍然期望于波旁王朝的复辟。第二帝国的全民公投让他们大感失望。从第二帝国的投票情况可以看出在保皇党势力强大的地区,弃权的人数与不在少数。在19世纪上半叶,正统派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对所有政权都采取不怀好意中立的目的。

自由派和奥尔良派并没有如波旁派那么坚定,他们已经发现他们已大势所去,于是他们对当局展开极为猛烈的批评。各种各样的沙龙都是他们批判的阵地。他们通过种种傲慢无礼的抨击来逃避现实。

在19世纪的法国,“传统”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含义有所变化。^①有一种公认的传统是封建传统,但到底什么是封建传统,答案并不清楚,因为极端保皇派 (ultra-royalistes),保皇派中的正统派(légitimistes)或波旁派所坚守的,可能只是我们所理解的封建传统的一部分。还有一种我们常常忽略但实际却很重要的传统,那就是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传统对19世纪的法国人来说,启蒙运动和大革命都已经成为传统,相对于旧制度而言,我们可称之为新传统。新老传统都包含多种多样的思潮,而工业化进程又产生了各种新的思潮,这样,在19世纪法国大体上存在三种文化力量的冲突与合作:老传统;新传统;新的现实需要,即随工业化而来的新思潮,包括劳资冲突及其在思想上的种种反映。新传统与老传统间的断裂远未弥合,新的现实需要在继承部分传统的同时,又对各种传统提出挑战,或者说,工业革命又造成了新的断裂和分裂。无论保皇派、大小资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他们与旧传统、新传统都发生联系,但各自与这些传统的联系大异其趣。至于“保皇派”,其含义更为复杂。首先,是主张立宪的还是主张旧制度的才算保皇派?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拿破仑帝国结束后上台的路易十八就不是保皇派,因为他建立的复辟王朝是有议会的,议会是按他即位前公布的《宪章》建立的,他本人还未到巴黎,就先在巴黎贴出告示,宣布现存的代议制政府将保留下来,分成元老院和由各省代表组成的众议院,他还宣布公众自由、私人

^① 这里暂不说人类总是在不断伪造传统。比如,西方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当代西方的许多传统都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创造出来的。

自由和信仰自由将得到保障,新闻自由将得到尊重,但除了那些维持公共安宁所必需的措施。^①后来证明这个复辟政权延续了拿破仑的土地政策,它给予人民的“自由”在某些方面比拿破仑所给予的还要多,其议会的权力也较拿破仑时期更大,复辟王朝最有名的一些学者或政治家,像自由主义者贡斯当、经济学家萨伊历史家和政治家基佐等都是新教徒!说明经过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洗礼,宗教迫害在法国已经没有市场。实际上,早在1815年,被认为属于最激进民主运动左翼的里戈梅·巴赞(Rigomer Bazin)(就出人意料地把路易十八颁布的宪章解释为建立某种基于代议制的宪政政体的一个机会,两年后他又曾设想一种“王朝共和国”或“代议君主制”(Monarchie représentative)的可能性^②。

因此,如果说主张保留国王的路易十八及其支持者是保皇派,那么启蒙运动中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或法国大革命中最初掌握政权的斐扬党人也是保皇派,因为他们都赞成保留国王,从形式上看,上述各种政治势力都既主张保留一个权力很大的国王,又主张建立一个权力很大的议会,为什么他们之中有的被称为保皇派,有的被称为君主立宪派?世纪初的自由派一般而言并不是共和派,他们赞成的是宪政,并不主张废除国王,因此,有必要区分自由派与极端保皇派在对待国王上的区别。基佐曾在著作的前言中这样问道:“试图保持合法皇权的同时,建立一种宪法秩序(这一目的是通过旧制度的一些准则)实践和神佑来实现?还是通过新法兰西的各种准则与联盟来实现?也就是说关于立宪政府、保皇派与自由派有不同的理解,而复辟王朝的态度则模棱两可。就路易十八而言,他骨子里也许是一个极端保皇派,但为了维持稳定,表面上又不得不装成一个立宪派,这种情况导致政府办事效率低下。如基佐所说:”法兰西对自己没有信心,政府也没有力量。”^③其次,保皇派所支持的国王或皇帝,也有本质的区别,他们中有的支持波旁王朝的国王,有的支持第一帝国的皇帝,有的支持七月王朝即奥尔良王朝的国王,这些人分别构成了保皇派的三个派别,他们之间的差别有时就像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差别一样大,因为波旁王朝代表旧制度,而拿破仑某种程度上代表大革命。最后,保皇派的支持者也很复杂,我们习惯上总是认为支持保皇派的是三个王族或跟随三个王族的贵族及大资产阶级,但常常忽略了19世纪支持法国保皇派的两种基本力量,农民和资产阶级。农民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保皇派,直到第二帝国的建立都是如此,这是他们与工人不同的地方,但农民的思想是如何表现出来的或通过什么形式来表达的?路易十八的宪章反映了这种情况,它承认农民在大革命中取得的土地所有权,关于这个时期农民的政治

^① G.de Bertier de Sauvigny, *Au soir de la Monarchie: La Restauration*, Hachette, Paris, 2007, p.59.

^② Pierre Serna, "Rigomer Bazin de la Restauration: penser la République dans La Monarchie",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2001, p.55.

^③ François Guizot, *Des moyens de gouvernement et d'opposition dans l'état actuel de la France*, Paris, 1988, pp.35-36.

作用，马克思指出：“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正如波旁王朝是大地产的王朝，奥尔良王朝是金钱的王朝一样，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他还进而指出：“农民反对其他各个阶级，这是农村反对城市的表现。”^①马克思同时从阶级关系和城乡关系来看待农民的政治态度，农民想保住大革命带给他们的成果，但他们中大部分人并不希望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在一定的时期他们的愿望几乎左右着法国政局的发展，关于这时期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恩格斯在论及路易·波拿巴上台的原因时说道：“那时资产阶级大部分还是保皇主义的，并且分裂为三个王朝政党和一个共和党，它的内部纷争使得冒险家路易·波拿巴能把一切权力阵地即军队。”^②警察和行政机关尽行占据，并且把资产阶级的最后堡垒即国民议会也打碎了。^③

上述种种复杂性，造成了这一时期法国社会思潮的混乱和无序，但人们面对的是共同的现实。所要解决的是共同的问题，所以他们的追求又具有某种共性，甚至不同立场的人有时会赞同某些共同的解决办法，这构成了各种思潮重组或整合的基础。首先，大多数人都在怀念过去，批判现实。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人突然迷恋于回忆和地方的空间，以至于巴黎作家阿里斯蒂德·吉贝尔宣称：“通史被分解成了地方史”。人们对居住地或出生地有一种特别的归属感和亲切感，历史学家安德烈·勒格莱等人还“赞扬对传统的崇拜和对地方记忆的崇拜，这种崇拜甚至构成子女孝顺父母的一种义务，对扎根于过去的土地的一种爱。”几乎所有的阶级或阶层都在怀旧，既出于美化的想象，也出于对过去某些恐怖事件的回忆或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其表达形式多种多样，每个人都似乎能从怀旧中获得某种心理满足（以前的官员向往国家过去的伟大资产阶级的年轻一代怀念革命中年轻人掌权的时期，与之相应的是农民对回到封建统治的恐惧，贵族对恐怖时期的恐惧，激进派对滥用自由的恐惧，下层阶级也在怀旧，由于越来越陷入资本主义的深渊，他们向往平等，怀念曾给他们带来某种家长制保护的旧制度。在当时的法国，种种怀旧与恐惧的相互交织，解释了该世纪上半叶反复出现的紧张关系。这里，怀念过去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表现。19世纪上半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同阶层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猛烈抨击早期工业社会的种种弊病，我们比较熟悉的有两种批判，一种来自圣西门、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另一种来自以巴尔扎克司汤达等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这时期还有两种很有影响的批判，一种来自共和派，批判复辟王朝和君主立宪制，主张建立共和国，另一种来自被大革命推翻或受到大革命重创的贵族阶级，他们希望恢复过去曾拥有的地位和美好的生活关于这些怀旧与批判的性质和原因，恩格斯作过以下说明。大革命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6页。

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化为普遍的幸福,反而由于沟通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的犯罪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增加。如果说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干出来的封建罪恶虽然没有消灭,但终究已经暂时被迫收敛了。那么,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化为竞争中的蓄意刁难和忌妒,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刀剑成了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总之,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这种情况使很多人怀念过去那些美好的方面,农业社会的生活虽然贫困,且处处表现出不平等。但一般情况下毕竟还是稳定的。

其次,几乎所有的政治力量都承认社会失序,都强调恢复秩序与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性。19世纪初,法国各派思想家对法国现状的看法惊人地一致,即法国最重要的社会问题是重建秩序,孔德这样的自由派与夏多布里昂那样的保皇派都认为混乱已达到极点,孔德还形象地指出:“社会被国王们倒退的学说与人民的批判激情撕裂开来,每一方都把它往自己的方向拉扯,无论如何,政治只是众多流产的重组而已,是许多不断波动的实践和尝试^①。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不仅把拿破仑上台看成法国人追求秩序的反映,而且他还强调社会动荡甚至使民族成员中的最愚昧无知的人产生了恢复秩序的愿望,许多人不仅追求社会稳定,还希望社会和谐,巴斯夏是一个典型,他在1850年出版的《和谐经济论》中这样描述当时:“浸淫全国的一切”的“无政府状态”,“穷人反对富人,无产者反对财产,平民反对资产者,劳动反对资本,农业反对工业,乡村反对城市,外省反对首都,本国居民反对外国侨民,由此他问道:“如今社会最引人注目之处,不正是没有任何秩序吗?所以关心未来的善良的人们,进步的著作家和思想界的先驱们正在努力探索的不正是一种秩序吗?接着他这样告诫法国年轻人:”^②我希望引导你们去认识一切正常的利益彼此和谐这个真理,这便是本书的主旨,你们不会不懂得它的重要性。

类似的追求决定了人们所讨论的问题也是相似的,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法国各派政治力量展开的旷日持久的争论虽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但大都围绕着以下相同的问题展开:(1)如何对待启蒙运动和大革命?是全部否定,还是部分否定)只否定其机械的或“形而上学”的方面,这种争论着重围绕着启蒙运动和大革命提出的各项原则及认识社会的方法来进行,而不是大革命造成的某些现实,(如分到农民手中的土地)。(2)如何看待大革命中的暴力,“牺牲”的概

^① 圣西门:《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2、14页。

^② 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和谐经济论》,章爱民译,机械工业出版社,1985年,第65、49、34页。

念成为大革命后法国人围绕政治暴力展开辩论的主要议题之一，在这种辩论中，极端保皇派的迈斯特居然与主张无产阶级暴力的工团主义者索雷尔有不少共同语言，比如两人都谴责雅各宾派的国家暴力传统，赞扬古代殉教者对共同体凝聚力的意义。（3）法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权，是君主制（立宪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应该建立什么样的道德体系？具体又分为如何对待传统和宗教两个方面，（5）如何处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虽然通常认为英国工人在产业革命中遭受了极其悲惨的待遇，但与英国相比，当时法国工人可能处在更加可怜的境地，至少在法律地位上是这样。^①再次，许多人都不同程度地主张借助传统来恢复秩序，追求稳定，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如何处理传统与现实的关系，也就是如何建立新的社会联系，传统的重要性被提上议事日程。大革命摧毁了旧的社会秩序，新的社会联系尚未牢固地建立起来，社会变得支离破碎，拿破仑深知割断传统与现实的联系很危险，他上台后为了，重新调和被世俗战争与宗教战争所分裂的法国与教皇签署了，教务专约。承认天主教为法国大多数人的宗教，即使像夏多布里昂那样的保皇派，也看到了当时法国问题的实质，他的，阿塔拉，基督教真谛的成功。不仅在于他讨论回归信仰问题，而且还在于他提出了将纠缠 19 世纪的一切政治哲学的问题。即该如何在没有宗教支持的情况下建立社会联系？^②恢复传统是医治社会断裂的一种重要方法，是整合混乱的社会思潮和信念的基本途径，但复什么传统或怎样恢复传统，是各派政治力量角逐的重要战场，这涉及对旧制度，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的具体评价，极端保皇派以旧制度的代表自居，竭力美化中世纪的王权，自由派或波拿巴派虽对启蒙运动和大革命有所批判，但不会加以全盘否定，像孔德这样的自由派，则企图把保皇派的某些合理主张与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结合起来，由于秩序与和谐同时也是文化或道德伦理问题。因此，在讨论如何对待传统时衍生出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宗教。在当时的法国，宗教不仅用来维系民心，而且还能抑制由启蒙运动，大革命和工业革命所激发的激情和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巴克说道：“为了平息这种激情和重创社会联系，宗教上的探索与政治上的努力是不可分离的”圣西门在探索一种，新基督教教义，拉

^① 索维尼指出在当时的法国，工人不准向政府提出“劳动自由”之类的问题，他们没有权利保护自己，不能建立自己的组织，不能罢工。拿破仑的立法把他们置于严格的监管之下，他们必须持有一本由警察局发放的小本子，否则不能迁移，不能受雇佣。与老板发生工资纠纷时，“主人凭一句话就能得到信任”，而工人必须提供证据。根据《刑法典》，工人建立组织要被投入监狱，而这方面对他们东家的惩罚只是敦促他们改正。工人必须向法院起诉才能得到应付的工资，而东家可以扣留部分工资来收回借款，劳资调解委员会本来是承担工业中治安裁判的角色，但其成员大部分是东家及工头和特权工人的代表。见 G.de Betier de Sauvigny, *Au soir de la Monarchie, Histoire de la Restauration*, Hachette, Paris, p.256. 而在英国，1800 年国王乔治三世颁布的《棉纺工业仲裁法》规定：当雇主和雇工发生工资等纠纷且他们双方无法自行解决时，双方都有权要求仲裁，双方可立即提出各自的仲裁人，授权他们代表自己进行协商，双方仲裁人必须认真听取当事方的意见，详细了解情况，包括向证人进行问询。他们作出的仲裁应该是最后仲裁，如果双方仲裁人在提交仲裁协议书后的三天内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不能签署裁决书，他们就必须马上就近诉诸法官，向法官陈述争论的情况，法官的决定是最终决定也必须在三天内作出。

^② 米歇尔·维诺克：《自由之声：世纪法国公共知识界大观》，吕一民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28、29 页。

梅内则出色地描绘出某种神学政治的特征,那些拒绝宗教权威的人,也无法回避要一种新宗教的意图。”^①如果说思想家们经常争论得面红耳赤的话,那都是围绕一些共同的问题,他又说作为过渡时期社会危机的一种反应,人们总是处于不安和躁动之中,因为他们仍然被大革命激情所震荡而又不适应利益世界的平淡无奇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教权的任务就是通过平息激情和重建社会联系的方式,创建一种共同观念。圣伯佛在参议院批评上流社会利用宗教作为政治工具的做法,但持有这种批评意见的上层人士当时还是少数,强调宗教的作用,是基于对现实的认识,正如圣西门所说的:“人们声称法国革命彻底摧毁了封建和神学的权力时,这是夸大其词,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19世纪的法国,教权派长期拥有那么大的影响”^②。

最后,很多人都强调通过政府干预来修补分裂的社会,要建立秩序与实现和谐。不仅需要重建与传统的联系,还需要解决工业化过程产生的新的社会分裂。如果说继承传统是一个修补断裂的问题,而且主要涉及道德文化或政治制度,那么解决社会分裂首先是一个现实的经济问题。修补分裂的社会虽说是各种政治力量的共同追求,但在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上却深刻地暴露出它们的真正分歧。在该问题的讨论中,后来被视为资产阶级主流思想的自由主义一度显得很孤立。被淹没在众多思潮的汪洋大海中,而空想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则一度如日中天,颇为引人注目,保皇派的办法是回到过去,但他们的影响随着工业化的进展而日渐衰微,渐渐占据重要地位的社会分裂是资产阶级各派的冲突,资产阶级与工人的冲突,还有城乡冲突及农民与工人的冲突,这些冲突似乎使问题的解决变得越来越渺茫,以往我们更多关注的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冲突,较少关注其他冲突,一般避谈工人与农民或城乡的冲突,实际上马克思也非常重视后一种冲突。在《1848年至1850年至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他说道:“农民不得不负担二月革命的费用,于是反革命就得到了他们这个重要力量。四十五生丁税,对于法国农民是个生死问题。而法国农民又把它弄成了共和国的生死问题。”^③他又说:“和国通过收税人向这个阶级表明自己的存在,而这个阶级则通过皇帝向共和国表明自己的存在。”^④法国的城乡冲突还包含着首都与全国其他地区的矛。

上述种种冲突使法国思想家普遍萌发有组织干预的思想,这种主张一度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与自由主义格格不入,这特别见之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要求,他们虽然常常互相攻讦,但都强调通过一定的组织和领导,国家干预或其他形式的有组织的干预来解决社会问题,他们认为:“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自由主义运动只

^① B.Le Clère et V.Wright, *Les Préfets du Second Empire*, Paris, 1973,p.34.

^② F.Caron, *La France des patriotes de 1851 à 1914*, Paris, 1985,p.56.

^③ Delotel, *Aux origines de la Commune: le mouvement des réunions publiques à Paris, 1868-1870*, Paris, 1980,p.123.

^④ L.Girard, *Nouvelle Histoire de Paris. La deuxième république et le second empire*, Paris, 1981,p.58.

是助长了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社会因此而四分五裂。所以，重整社会秩序(建立新的合作组织和社会集体已经迫在眉睫。由此出发，他们提出来的解救方案都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因为他们认为政府应理性地组织国家的经济生活，而不应该依靠具有破坏性的自由竞争去做这件事。许多并非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或政治家从维护秩序出发，也持有类似见解。他们认为：“为了平息激情，更主要的工作应该是重建社会联系而不是议会自由主义。各种观点的人都拒绝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因为曼彻斯特或伯明翰的英国个人主义，给人看到了灾难性的后果”^①巴克还强调指出：“令恩格斯气愤的工人贫困，正统主义的改革者并非无动于衷，像自由主义者托克维尔在他的1835年游记中，或是共和主义者赖德律洛兰在他的1850年出版的《论英国的衰》中，都有所表现。因此，困扰着人们的这种贫困和社会解体现象，横贯着整个政治角逐场，说明法国在经济自由方面存在着弱点。”^②在严重的社会分裂面前，自由主义的主张似乎寸步难行，要求政府干预的呼声颇有影响，限制经济自由忽然间也变成了所有进步党人的口号，致使迄今为止在政治流派中作为精神主导的自由主义处在了守势。当然，自由派也竭力表明自己关于如何实现社会和谐的主张。比如，巴斯夏说道：“资本家和工人们，我觉得自己有能力提出下述规律：资本从生产总值中的绝对提取额随着资本日益积聚而增加，提取比例则下降”^③。与此同时，劳动从中提取的相对比例增加，其绝对提取额增加得更多，资本缩减时则引起相反的效果。如果这条规律得到确认，就可证明，劳动者及其雇主之间显然存在着利益的和谐。这里的意思是：“工人们，你们得暂时忍受一下目前的苦难，随着资本的增长，你们的工资就会增加，生活就会得到改善^④。”其实，孔德的主张也与此类似。但这种思想在1848年革命前后不会得到多数工人的支持，所以在经济发展的这个阶段，法国的社会分裂难以得到缓和。综上所述，这时期法国思想界整合社会断裂和社会分裂的努力，虽然不能说没有效果，但在当时这种效果有多大值得怀疑。也许，处在这样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只能如此，其各种努力主要是为未来的全面整合奠定某种基础。

第三节 经济分化日趋严重

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中产阶级的乐园：城市大道上布满耸立的各大百货商店

^① Francois.Loyer, *Paris XIXème siècle: m L' emmeuble et la rue*, Paris, 1985, p.43.

^② Bergeron .Louis, *Paris: Genèse d' un paysage*, Paris, 1989, p.24.

^③ Citron.Pierre, *La poésie de Paris dans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de Rousseau à Baudelaire*, Paris, 1961, p.67.

^④ Citron.Pierre, *La poésie de Paris dans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de Rousseau à Baudelaire*, Paris, 1961, p.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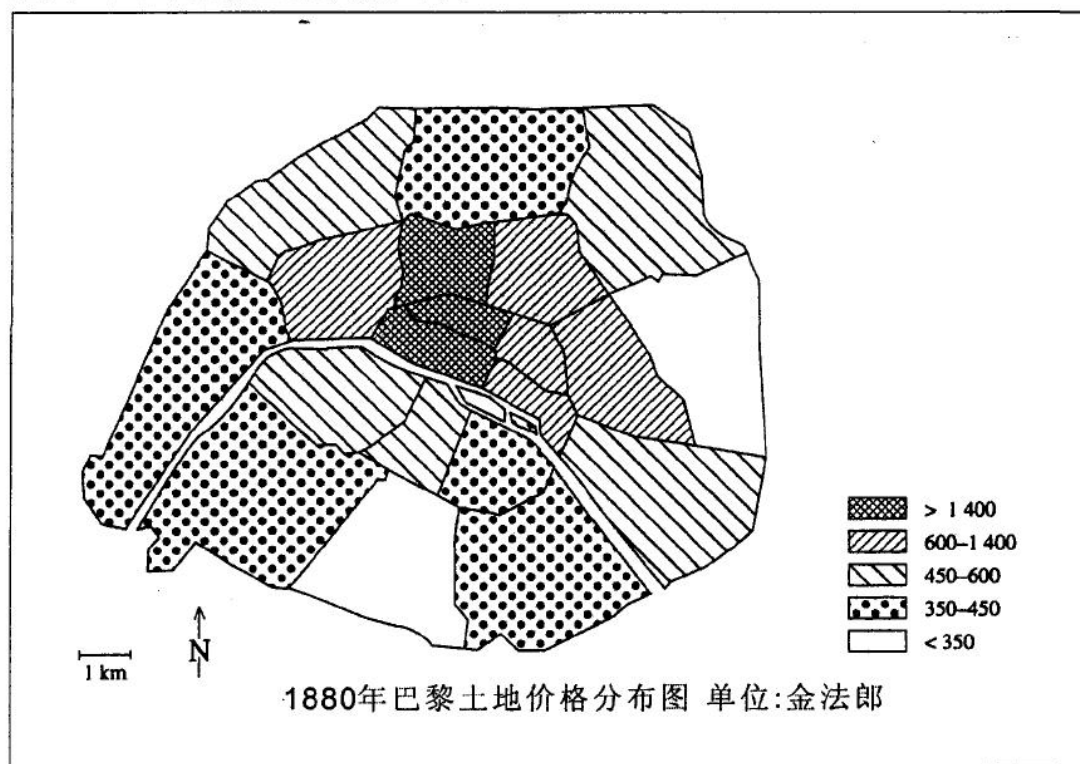
满足了妇女们购物的欲望，奥斯曼改造下各大绿色公园成为了中产阶级平时闲适时享受的场所。越来越健全的铁路网吸引了法国各地游客来到巴黎城旅游。事实上，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城在全世界都享有盛名，是各种享乐主义的聚集地。然而，下层阶级的生活又是如何呢？他们的精神状况，心里状态又是怎样呢？在这个时期，“波西米亚”和“波西米亚人”这两个词进入了法语体系，用来指代一群年轻人，他们憎恨金钱、国内工作，以及各种中产阶级的平庸享受。这些年轻人中有流浪汉、酒鬼、不合群的人、诗人、记者、好色之徒、自恋者、哲学家等等。

或许，对于瓦尔特·本雅明没有什么能比城市更加魅力无穷既让他迷恋不已，又为他厌恶排斥。一方面，本雅明与城市可谓意气相投，其文学创作也受惠颇多！在他有关城市写作的字里行间！处处隐蔽而热切地表达着对城市的依恋。另一方面，本雅明又时刻保持着警觉！似乎从未完全相信城市能完全成为他个人慰藉的所在地事实上。他有关城市的写作往往致力于揭露城市的迷幻和野蛮，探讨城市日常生活的非人性和人类经验的消失在本雅明这里。城市往往呈现出雅努斯（Janus）的两面性——文明与野蛮、希望与绝望的相互结合。

帝国的社会习俗也正经历着一种重大变化，“出身”这个古代政制中评判社会身份的唯一标准被金钱这一新的普遍性社会所指代替，属于新贵的资产阶级自然不希望与那些被他们划入危险阶层的无产阶级居住在同一个地区）这种社会阶级的区隔最初曾以垂直隔离的方式存在，同一栋房屋，富人住在上层，穷人住在底层）后来，平行隔离的方式广为采纳，富人在巴黎有自己的活动中心，而穷人则有自己的特定领域。这种现象从18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到了世纪前半期资产阶级新贵们开始远离城市中心，向偏远的西部迁移，而巴黎的东部和中心地区则成了穷人的领域。在西部，在居室，资产阶级不仅获得了理想中最为安全的私人空间，他们还极其慷慨地利用收藏品和其他各种装饰物使这个隐秘的避难所四壁生辉。

奥斯曼的巴黎改造运动对巴黎这座城市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城市经过改造，地价飙升，急剧上涨。据统计，“巴黎的不动产价值由26亿法郎上涨到61亿法郎（新建筑价值为20亿，老建筑价值为26亿，经过改造后老建筑升值15亿）。^①”地价呈现的变化是：中心城区地价最高，某些环境好的近郊地价仅次于市中心，远郊的地价最低。下面是1880年巴黎的地价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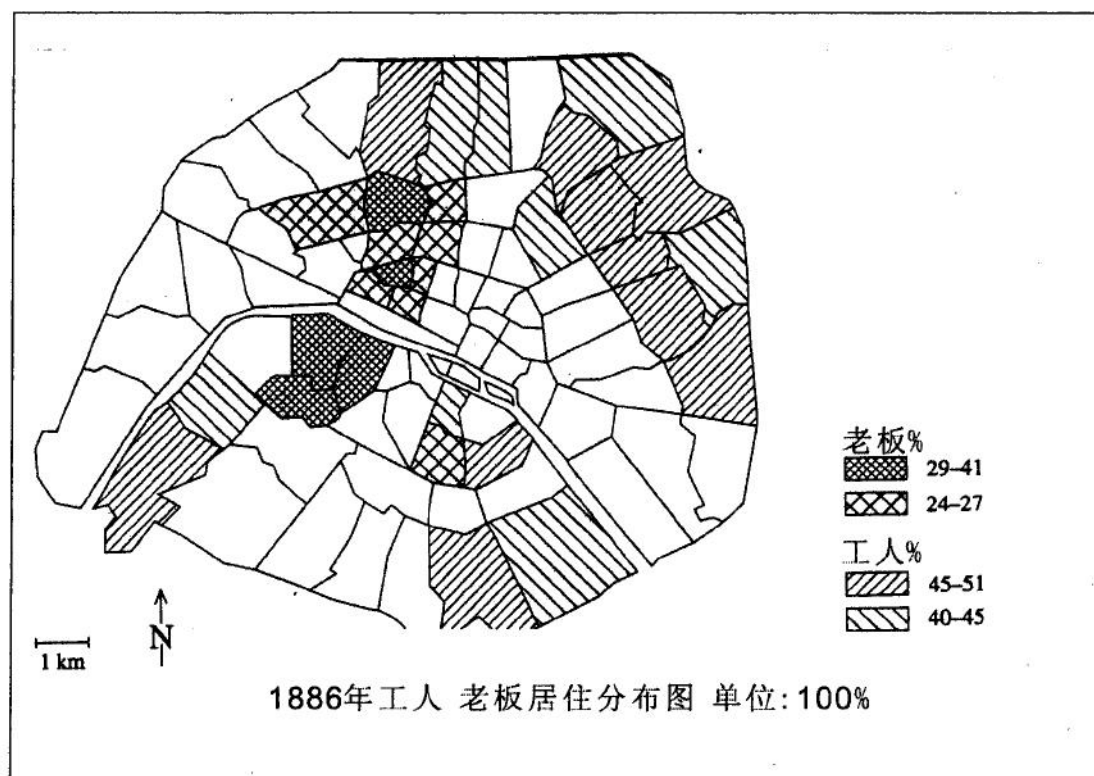
^① J.Bernard, *Les Deux Paris: Les Représentations de Paris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XIX^{ème} Siècle*, Paris, 2001, p. 68.



上图^①表明，巴黎市中心区域以及塞纳河右岸土地价格最高，这是因为市中心的人口稠密程度最高。这是因为，市中心原来就是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商业发达，生活设施完善。改造后，城市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人口密度比改造前人为的降低，所以地价上升是在所难免的。同时交通条件的改善，使得市郊的人口更容易进入市中心，人流量的增大也是地价上升的一个重要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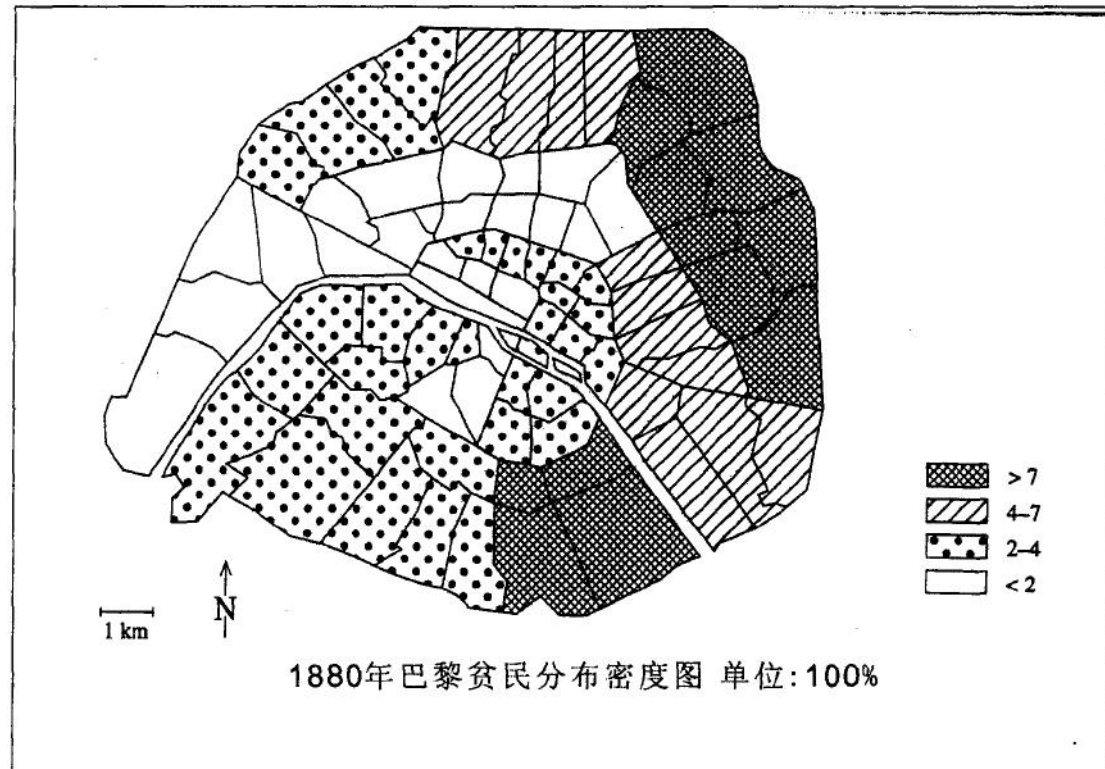
其次，城市中心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人口分布的变化。改造后，地价大幅度上涨，直接促进了城市产业结构的提升，巴黎成为法国工业革新的中心。因为市区地价的上涨，一些规模较小、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企业不得不从市区搬到郊区甚至外省(如制衣、纺织等)，市区仅成为商业、服务业中心。

^① Marchand, Bernard, *Pairs, histoire d'une ville au XIXe-XXème siècle*, Editions du Seuil, 1993, p.138.



上图^①显示，一方面，市中心的产业基本上以服务业和商业为主，故产业工人和资本家(老板阶层)人数人少。而自然环境和生活设施好的近郊则成为资本家(老板阶层)的主要居住地，工人阶层则只能迁往地价较低的城市的外围。另一方面，当时由于交通方式的制约，工人一般住在离工厂较近的地区，所以这张图也反映了:改造后，工业企业已很少安置在市中心，近郊或远郊由于地价相对较低，交通条件也较以前大为改善，工业企业大部分集中到城市的外围。改造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城市居民的两极分化。由上文可知，改造后城市的中心地带地价大幅上涨。因此，只有富人才可能住在市中心并享有完善的生活设施，而穷人则只能向城市的外围扩散。

^① Marchand.Bernard, *Pairs, histoire d'une ville au XIXe-XXème siècle*, Editions du Seuil, 1993,p.131.



上图^①表明，巴黎当时的贫民多集中在城市的外围，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地价的高低和企业的分布是决定贫民分布的主要原因。对于这样一场工程浩大、历时漫长的改造，当时的反对声音也异常强烈，在当时反对者主要抓住三点：首先，他们认为，建筑的大规模拆迁和再重建导致这一时期房屋紧张，引起了住房危机。其次，大规模城市建设使得投机倒把、贪污受贿之风盛行。其三，改造的结果加剧了社会的阶层对立。

实际上 1850 — 1860 年期间住房危机就已经很严重了，当然，城市的改造是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人口的迅速增长。如果把城市改造算作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在拆迁与重建的时间上的冲突所造成的。但从最终的结果来看，奥斯曼的改造实际上是极大的缓解了当时的住房危机，因为从 1852 年到 1869 年，拆迁房子数量为 127, 553 套，而在建房子数量为 215, 304 套。^②房屋价格和房租快速上涨的确是事实。让那·热纳赫(Jeanne Gaillard)认为第二帝国是房地产业的黄金时期。1821 到 1850 年之间，巴黎平均每年新建房屋约为 260 套；而 1851 到 1860 年在市区平均每年新建房屋为 1, 240 套，市郊为 3, 600 套；1860 年巴黎市区扩大后达到 5, 000 套之多。”^③

所谓的投机，主要指有些人可以提前获得一些内部信息投资地产，从而在以后的地产交易中获利。事实上，情况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糟糕。阿尔布瓦舍认为当时投资者对于对抗公众的投资行为是非常谨慎的。市区的改造工程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私人资本进行投资。如，工程开始 18 个月后，市中心的斯特拉斯堡大道和学院路都没有完工，主要原因就是没有资金的注入。^④此外，很多工程投资

^① Marchand.Bernard, *Pairs, histoire d'une ville au XIXe-XXème siècle*, Editions du Seuil, 1993,p.139.

^② Marchand.Bernard, *Pairs, histoire d'une ville au XIXe-XXème siècle*, Editions du Seuil, 1993,p.24.

^③ G.Duveau, *La vie ouvrière en France sous le Second Empire*, Paris, 1946,p.58.

^④ L.Girard, *La Politique des travaux publics du Second Empire*, Paris, 1995,p.32.

者也不感兴趣，拿住房来说。让那·热纳赫通过研究认为：当时工薪阶层的房屋成本造价平均每平方 700 法郎，但租金只能达到每平方 7 法郎；而中产阶级的房屋成本造价平均每平方为 1000 法郎，但租金能达到每平方 18 法郎。很显然，投资后者获利空间更大。问题是，在整个工程中，要新建的中产阶级的房屋所占比例并不是很大，大部分要建的住屋还是为了工薪阶层，毕竟中产者或富人占人口的比例不大。由此看来，私人资本对于直接投资房屋的热情并不时很高。奥斯曼的改造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对立，在改造的过程中我们能很明显的感到巴黎与郊区、富人区与工人区、塞纳河右岸与左岸的不同。从房屋设计上来看，富人区的(资产者)的房屋外墙一般是用石料，而工人或穷人的房屋一般用砖；富人的房子结构更合理，至少有一间佣人房和洗漱间，而工人或穷人的房屋中一般没有这样的设计。经过奥斯曼的改造，在巴黎的地图上大致的区分了富人与穷人居住范围。设施和环境较好的区一般集中在西部，工人居住的区一般集中在外围的东、南、北部。市中心的东部一般是中产者、小资产者、商人居住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人构成了第三阶层。

对奥斯曼批评最激烈的当属保守派的茹勒·弗赫耶(Jules Ferry)，他极力批评奥斯曼的改造。首先他也认为奥斯曼当时的工作没有消除社会的紧张，反而加剧了社会的分裂。但他对资金问题更感兴趣。实际上，改造工程花费巨大，这一点上就直接导致了市政预算的失衡。从 1821 年到 1850 年，市政预算非常平衡，资金总量上也变化不大。每年的收支大概在 5 千万法郎左右。收入主要来自间接税(占总量的 70%)，大部分是市场管理费和营业税。开支方面，社会救助一项占到 14%；政府经常性费用占 12.5%；还本付息占 11%；加上国库收入预先扣留(其中有 10%被巴黎地方政府占用)。直到 19 世纪中叶，除了平时养护费用，大型市政工程只占到每年财政预算的 12—16%。而在奥斯曼当政期间，年度预算突飞猛增。1852 到 1859 年之间，每年市政工程花费平均在 2 千 5 百万法郎左右，即收入的 30%(是以前的几乎两倍，其中 1859 年达到 8 千万法郎)。1860 年规划调整，巴黎市区扩大后，政府收入增加到 1 亿 4 千万法郎，1868 年达到 1 亿 5 千万法郎，这是 1851 年的三倍。但是财政预算还是不平衡，仅 1868 年，仍有 10%的财政赤字。据阿尔方达(Alphand)估计，到 1872 年，整个改造工程总造价大约为 12 亿 2 千万法郎。但是加上一些间接费用，以及一些到 1885—1890 年左右才完工的工程，据估计整个下来，花费大约在 25 亿法郎左右，即相当于那个时代法国一年的财政预算。当然政府不会付这么多钱的，大部分要巴黎人自己来付，1851 年每户家庭要交 48 法郎的建设费，到 1860 年上升到 61 法郎，1868 年上升到 83 法郎，但这些好像还不足以支付巨大的工程款。”^①

^①Bergeron. Louis, *Paris: Genèse d'un paysage*, Paris, 1989, p.124.

通过改造,巴黎实现了从一个封建的城市向资产阶级的城市、一个从外表来看全新的有创新的城市的转化,巴黎新城区变得更加规整,有力地带动了更多的不动产的投资。道路的延长和街区的改造使得主要沿街建筑物外观都得到极大的改观。城市环境变得更好,“资产阶级又回到那些奢华的房子里,他们也不再故意的隐藏自己的财富,随着自身力量的增强,这些顾忌也越来越少”。^①整个

城市变得越来越资产阶级化,例如:楼层的高度统一,贵族的楼层消失了,贵族阶级也消失了。同一个栋楼的结构都相同,只是不同的街区有所区别。

当然,这种景观上的一致也冒有千篇一律的风险。但奥斯曼知道如何在细节多样化上和整体统一上取得和谐。奥斯曼的和谐统一观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在确保整体一致的基础上如何取得细节的多样化。其次,对城市具体规划作出合理的安排。在奥斯曼之前,一直没有相应的规定来规范建筑物的高度和道路的宽度之间的比例关系。1783年的皇室条例只对两类建筑物进行了规定:传统建筑,高度不能超过12米,道路的宽度不能超过8米;住宅建筑的高度可以达到17.54米,道路的宽度可以超过8米(通常,街道的宽度在10—14米之间)。奥斯曼强制性的规定城市建筑物的相应的比例关系,确立了道路宽度和建筑物高度的关系,主要就是建筑物高度和道路的宽度都为18米。那么稍宽一定的道路,是否也要这样规定呢?1859年条例修正案同意了道路的宽度可以放到20米。^②

为了防止道路的宽度的过分扩大,奥斯曼在道路两边种上树。这种以和谐为理念的资产阶级的城市和过去的传统城市是彻底的决裂了,在空间上其组织形式多种多样,各个建筑自成一体,各具特色。

综观奥斯曼所领导的17年的巴黎改造,大规模拆除重建导致的结果是:社会产生了分裂,大批工人、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小业主被赶到完全没有基础设施和卫生环境恶劣的郊区去居住。持续17年的改造,对市民阶层来说是一场持续的灾难,大规模的拆迁使得城市的多样性被迅速摧毁;大量的简单就业机会消失;新建的楼房价格高昂,一般市民难及企及,社会矛盾迅速激化,这种矛盾在随后的巴黎公社工人运动中得到了证明。

不可否认,奥斯曼的铁腕让巴黎天翻地覆。时至今日,仍有法国人称他为巨人。有评论说,拿破仑三世华而不实,要是没有奥斯曼的铁铲,他的许多计划只是纸上谈兵。有人甚至称,当初假若有一个类似奥斯曼的人物来整顿法国军队,就不会有色当的战败,也不会丢掉阿尔萨斯省和罗兰省。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工业革命开始了机器工业时代,社会的巨变让城市这个人类生活的集聚点也产生了彻底的改变。农民纷纷离开家乡,涌向城市,城市人口爆炸性地增长,城市

^① Lavedan.Pierre, *Nouvelle histoire de Paris*, Hachette, 1975,p.236

^② Pinon.Pierre, *Atlas du Paris haussmannien: La ville en héritage du Seconde Empire à nos jours*, Paris, 2002,p.127.

急剧膨胀。这个时期欧洲城市规划缺乏整体性,建筑艺术衰退,城市环境景观质量下降,城市畸形发展。原因是在城市经济学家看来,这一时期的“聚集经济”远远大于“聚集不经济”^①聚集效应的作用十分突出。但是18—19世纪这种自发形成的聚集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控制。

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城市在改造旧城区与开拓新城区方面速度异常快。结果是这时欧洲的很多城市,因为盲目的追求速度、不重视规划,其城市的功能仅仅是为了实用的目的。“城市的布局大多是最简单和毫无个性的方格网,廉价的住房是沿着这些格栅排列起来的千篇一律的建筑单位。粗制滥造的住宅密集地堆集在生产点的附近,而典型的城市街道的惟一目的,就是在两者之间建立一个通道,就尺度和特征而言,基本上不可能成为其他的用途提供支持”。^②在这一点上,奥斯曼可谓棋高一招,虽然改造的任务重,时间紧。但他绝没有因为速度而牺牲质量。奥斯曼在巴黎建造的“奥斯曼式住宅”,统一六层的高度,统一把阳台设计在第五层:一层为商用房,顶层为佣人间,完全是以贵族品味量身定做,很快这种样式风靡欧洲。^③在城市建设上,奥斯曼起用专业建筑师完成城市设计,再施行重建工程,使改建后的巴黎仍不失为一个壮丽的都市,这些也都为后来的城市改造者所效仿。

第四节 下层阶级在艺术作品中的呈现

在资本主义阶级社会里,生活本身就充满了阶级斗争,每一个人都带有一定的阶级性。其次从艺术家自身所处的社会阶层的阶级属性出发,分析艺术家在描绘反映充满阶级斗争的社会生活时,不能根据自己的阶级立场、观点和美学理想,对素材加以选择和提炼,对生活加以描述和评价,要做到从客观事实出发,尊重历史,尊重艺术。最后从欣赏者的阶级属性的角度研究探讨,在当时的社会中,欣赏者各自具备自身的阶级立场和政治倾向,不同社会阶层的欣赏者对于同一类绘画作品会有不同评价。

艺术作品呈现出阶级性是因为阶级社会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讲到什么是社会意识形态时,提出:“社会意识形态是指属于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式,它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反映,在阶级社会里,它有鲜明的阶级性。”^④艺术在阶级社

^① Citron.Pierre, *La poésie de Paris dans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de Rousseau à Baudelaire*, Paris, 1961, p.246.

^② Lavedan.Pierre, *Nouvelle histoire de Paris*, Hachette, 1975, p.457.

^③ P.L'évêque, *Société en crise, La Bourgogne de la Monarchie de Juillet au Second Empire*, 2 vols, Paris, 1983, p.113.

^④ Bergeron.Loui, *Paris: Genèse d'un paysage*, Paris, 1989, p.345.

会中是具有阶级性的,艺术的阶级性是阶级社会所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阶级性是艺术的社会属性之一。生活在阶级社会的艺术家们通过自己的艺术作品艺术形象表现或传达出艺术家自己的思想意识和阶级立场。当艺术家置身于一定的阶级社会中,处于一定的阶级地位时上,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自身所处的阶级立场和美学观点出发选取、描写、反映和评价生活,表现所处社会阶层的思想情感,体现所处社会阶层的利益要求。在绘画作品中,有的作品阶级性表现得比较直接、明显、强烈;有的作品却很难看出具有什么阶级性,有的作品与艺术家所处阶级的阶级性相一致;有的作品却不完全一致,甚至相反。属于同一社会阶层的艺术家有时也会描绘出呈现互相对立的阶级倾向的艺术作品,属于不同社会阶层的艺术家也会描绘出呈现某种相同的阶级倾向的艺术作品,即使同一艺术家的不同时期的作品创作也会出现某些思想感情上的变化甚至是对立的复杂矛盾。因此,为了准确地把握艺术作品的阶级性,不能简单地从主观概念出发,根据艺术家的阶级出身去贴阶级“标签”,而应从作品的实际情况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深入细致地进行探究,注意它的复杂性。

艺术首先应该是人类文明智慧的结晶,具有人类普世价值,其次才有阶级性或阶层性,而不应该是仅为某个阶级服务的工具。在阶级还没有形成的原始社会里,人们共同劳动、共同生产、共同享受,艺术只是反映人们对自然界的斗争,反映人们征服自然的愿望,反映人们之间平等、互助的关系。在人类社会发 展进程中,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艺术,与一定的阶级发生密切的联系,也就带有一定的阶级性。这种阶级性,不仅表现在艺术创作中,也表现在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中。周恩来认为分析和评价阶级社会里的文艺作品时是不能离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大前提的。^①

马奈《草地上的午餐》、莫奈的《阿尔让特伊河沿岸(中产阶级住宅区)风光》、雷诺阿《游艇上的午餐》、德加的《芭蕾舞演员》、修拉的《大碗岛的星期日下午》等,无一不是以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情趣为题材。我们在其中看到的,是艺术家本人所从属的社会阶层、画中人物和作品的观众在社会关系上的一致性。这些中产阶级既不是无所事事的“多余的贵族”,也不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粗俗的小资产者,而是受过良好教育、有固定职业的中产阶级。他们的文化生活方式表现在在印象派画家笔下的消遣方式,实际上是他们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对通俗文化的消费休闲。与此相对应的,还有作为现代工业社会所分化出来的主要阶层——工人阶级的消遣方式,如修拉的《马戏团》、梵·高的《下等酒吧》等。

托马斯·克劳强调,在印象派画家的笔下,不同阶级标志的混合,是前卫艺术感觉模式的核心。库尔贝 1856 年描绘两个昏昏欲睡妓女的郊外游乐题材《塞

^①Pinon. Pierre, *Atlas du Paris haussmannien: La ville en héritage du Seconde Empire à nos jours*, Paris, 2002, p. 89.

纳河畔的少女》，后来马奈《草地上的午餐》和《奥林匹亚》的主题，就是在相当早的阶段追求商业性的娱乐，这种不和谐的关系和娱乐方式，必然会包含对旧方式的否定，成为合法性与犯罪行为之间新地带中违法的亚文化。直接导致了莫奈、雷诺阿和西斯莱在 1870 年代选择另一种策略，创作充斥着声色娱乐的周末消闲场景，将消闲转变为一种相对极端和唯一的价值。1880 年代，修拉《大碗岛的星期日下午》，将一种懒散和惯例化的资产阶级消闲生活置于另一种环境关系中，一种精疲力尽的工人阶级所无力顾及的关系。

印象主义是 19 世纪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文化及思想等连串变革的结果，隐含了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在经济方面越来越富足使贵族阶层失去了原本的阶级优越性，小资产阶级快速的发展史由于伴随着法国工业革命在工业上的大发展导致中等阶层向小资产阶级逐渐转化，传统作坊的手工业模式的产业逐步被工厂工业所取代，致使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的生活、思维、文化方式的新的社会阶层，即为小资产阶级阶层，并在经济 and 生活中显示出重要性，且占据了社会主导地位，小资产阶级的出现导致社会结构出现大的调整。^①法国城市的重建不仅带来经济的巨大发展，更带来法国文化的繁荣。新型水陆交通工具发明出现给画家们带来了新的绘画描绘对象，不论是桥梁、港口、船只、道路、火车站……还是郊外的野餐、林荫道路上散步的贵族、公园里闲坐乘凉的人、咖啡馆里的人物场景等等，这为艺术革新创作创造了条件，这些题材进入了艺术家的视线和画面。看似库尔贝、马奈、莫里索、莫奈、卡萨特等画家对社会和政治没有兴趣，他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他们的绘画作品上，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将自己的阶级意识相当自然的融入于绘画作品中。在这个时期，为什么会出现用画笔真实的反映社会的作品呢？为什么会出现偏离重大时代和社会事件的题材作品呢？为什么会出现描绘面向生活的琐事和不关痛痒的风景和花卉呢？为什么会出现花园、剧场、酒吧、阳台、游艇等表现资产阶级生活的场景呢？为什么会出现“奶妈”这一题材的绘画作品呢？还有描绘社会下层人们生活的劳动场景，如洗衣妇、仆人、劳工等？这些题材无一不是艺术家自身的所闻所见，无一不是艺术家自身社会阶层对日常生活描述的情感表达和阶级立场的呈现。

1872 年，“巴黎公社”遭到了资产阶级政府的无情镇压，这既是普法战争法国惨败的起因之一，也是法国工人阶级对社会不满情绪的直接表达。公社社员们的鲜血染红了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围墙。由于库尔贝、杜米埃等现实主义艺术家的直接参与运动而被逮捕并遭到流放。这种残酷的现实，使追随他们日后成为印象主义画家的青年们不得不面对，用一种极为隐秘的手法继续他们的抗争。他们竭力回避尖锐敏感的社会政治问题。很多艺术家、评论家认为他们开始不关心社会

^① C.Boyer, *The city of Collective Memory: Its Historical Imagery and Architectural Entertainments*, Cambridge, Mass, 1994, p.89.

的政治斗争躲避社会阶级问题。他们固然在躲避，但他们所表现的题材更为隐秘抽象，认为这些青年们常常在艺术作品中表现自然美，而对具有政治色彩或阶级色彩题材的艺术作品却很少或不出现在自己的作品中，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他们只是将自己的阶级立场、政治倾向隐含在自己创作的作品之中。

印象派画家们描绘的对象涉及到日常生活中各个方面和看到的景色。穿着整齐衣冠楚楚的男子和刚刚出浴的裸体女子在树林中野餐，他们的神情显得怡然自得的《草地上的午餐》；黑人女仆将男客送去的花束呈现给侧卧在床榻上的裸体少妇的《奥林匹亚》；在绿茵如盖的花园中，一位穿着整齐的风度翩翩的中年绅士双臂倚在长椅上，并向坐在长椅上的身穿华丽服饰的一位年轻贵妇夫人娓娓私语的《温室里》；一对情侣坐在游艇上欢度假日的《船上》；描绘一群头戴礼帽的绅士们拥挤到歌剧院后台给和他们相好的女演员送鲜花和谈情场面的《歌剧院的假面舞会》；有美丽女招待招待顾客的、灯火辉煌的、贵客满座的《酒吧间》；描绘闯进闺房的衣冠整齐的中年富商欣赏站在镜子前敷粉的穿着睡衣的高级妓女的《娜娜》；一群青年男女兴高采烈地吃着喝着和谈情作乐的《游船上的午餐》；描绘手持望远镜在东张西望的男子看着一个身着礼服盛装端坐的正在看戏的贵妇夫人的《包厢》；男男女女或窃窃私语或在悠扬的音乐声中踏步起舞的《露天舞会》；树荫下的男子对着站在秋千板上的娇媚的夫人在闲谈的《秋千》；穿着节日服装的有钱人观看赛马的《在赛马场上》……这些画作不仅描绘了都市与乡村的日常生活了，还将现实生活中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物描绘在画面上，并展现现实生活中社会底层人民劳作的场面和资产阶级腐败奢靡的生活场景。印象派艺术家们在绘画题材上的拓展还有社会生活中工厂冒着浓烟的烟囱、铁路，以及火车站等景观。艺术源于生活，画家笔下所描绘的是自身所处阶层的现实生活中瞬间或场景。蕴涵着印象主义画家自身的绘画立场与表述思想。

大多数分析局限于一个单一国家，因而很难对被描绘的阶级自身作出全局性的结论。对产业工人的现代表现的研究同样很少，中产阶级更乐意对画中的资产阶级进行讽刺，而不去深入广泛地分析画中的他们的及其他阶级的形象。娱乐业的工人，尤其是流行歌手、服务生和妓女，由于他们的形象更为常见，因此会涉及很多不同的阶层。一个服务生或女服务员，一个舞厅表演者或酒店歌手，所有这些娱乐业工人的身份职责，必由他们与一个顾客或观众的关系来定义，这个人通常是资产阶级，尽管并不是他们自己所属阶层。这一状况为描绘者研究阶级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机会，相比较而言，这一研究主题难以在产业工人及家庭的描绘中体现出来，因为他们使在相对而言阶级限定的地方生活和工作。

许多对现代艺术的最令人信服和具有道德意味的解读都涉及这种阶级的相互作用。也许，以这种眼光来解读的最经典的作品就是马奈的《弗里—贝尔杰酒吧》，

这幅看似在讲述小资产阶级的休闲主题场景的绘画作品中也讲述了一个工作主题的场景。图中仅有一位女招待,她独自站在一张摆满了各种待售货品的吧台后,啤酒、利口酒、香槟酒和水果。画面中有面巨大的镜子,对这幅画的镜中世界和真实世界的讨论不计其数。它们讨论了画作本身的主体性,这幅画对欲望的表现,以及城市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顾客或观者间的那种难以逾越的社会鸿沟。所有读解都引人入胜,其中许多是雄辩有力的,而它们却都将社会阶级当作这种画作众多含义中的主要部分。然而,在目前艺术史研究中,这幅画从被看作是一种平面性复杂图画错觉艺术手法的实例,变为对在一个不断膨胀的城市资本主义社会中提出的许多阶级和性的问题的写实性考察。研究阶级的历史再现的学术前景更为开阔。

马奈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艺术家,他的家庭主题画《洗》,表现了母亲和孩子在花园里把洗好的衣物晾在晒衣绳上的一个特写。莫里索也创作过家庭主题的作品,与马奈的《洗》所表现的是同一主题——《晾晒衣物的洗衣妇》,莫里索更有趣地展示了对旷野中几名妇女的鸟瞰,在背景和多云的天空下,一座房屋、一座桥和一些工厂侵占了这片乡村风景。

琳达·诺克林在《莫里索的〈奶妈与朱莉〉:印象派绘画中的工作与休闲》一文中将莫里索与1879年描绘的《奶妈与朱莉》这幅看似平常的母子图解读为一幅工作场景的绘画作品。《奶妈与朱莉》描绘的是家庭生活中常见的景象,画面中一位母亲正在哺育怀中的婴儿,婴儿安详的躺在“母亲”的怀里,享受着“母亲”那甜美的乳汁。画面整体的笔触非常的模糊,画面上的人物边缘也被虚化后融入整个绿色的背景中。画面中的“母亲”并非是怀中孩子的亲生母亲,而是给孩子喂奶的奶妈。奶妈为了生活放下自己襁褓中的孩子出来工作,从画面中能够看出她在对待孩子的态度上似乎不及亲生母亲的母爱那样真情流露。

想要深刻的理解莫里索的《奶妈与朱莉》这一题材作品时,必须将奶妈这个职业放入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解读。在19世纪的法国甚至是整个欧洲,奶妈这种职业可以说时候具有大规模的普遍存在的工作,从当时的社会与文化史的背景中来看,人们的生活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压力非常大,家中的女性不得不外出谋生,只能把孩子交给奶妈抚养,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去工作。也是这个时期,婴儿的死亡率非常之高,“整个19世纪的欧洲,有五分之一的新生儿不能存活,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孩子死于五岁之前,以巴黎为例,一半的婴儿都不是母乳喂养”^①,因此,政府颁布了法令去管理全国的奶妈和她们的顾客。而在贵族家庭和上层资产阶级家庭中无须依赖这种“被管理”的工业,她们通常会雇佣居家奶妈来照顾婴儿,带孩子去公园、哄孩子,但最主要的还是提供婴儿所需

^①Marchand. Bernard, *Pairs, histoire d'une ville au XIXe-XXème siècle*, Editions du Seuil, 1993, p. 34.

的营养。

从事奶妈这个职业的妇女多半是来自乡下的妇女，这些贫穷的乡下女人没有什么技艺又想多赚点钱，她们为有钱的贵族家庭和资产阶级家庭服务。19 世纪下半叶，上层阶级的有钱的女性很少会有人亲自给孩子哺乳，而只有少数的工匠阶级的女人有机会亲自给孩子哺乳，她们大都有自己的工作，但又往往住在拥挤的环境里。莫里索是出身于富裕家庭养尊处优的小姐，后为生活优裕的贵妇人，在她所生活的阶层中，雇佣一个奶妈是她所处的社会阶层的人都会做的事，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雇佣奶妈是上层社会阶层的标志。奶妈这个职业也显现出农村妇女阶层、劳工妇女阶层的工作状态之一。

莫里索在描绘她的女儿和奶妈的绘画中并没有试图去为某种工作作社会学式的记录，没有打算为哺乳工作留下某种典型的景象，也没有想要塑造这一母与子的典型形象。她仅仅是以家庭生活为素材，描绘日常生活中点滴的场景。而琳达·诺克林却从这幅画中读解到那个时代的关于奶妈这一行业的社会现象。在这幅画中艺术家将一些我们生活中耳熟能详的场景转化为另一种语言展现给大家，两个工作中的女人为同一个工作对象“她们的”孩子身体及阶级的限定而互相面对并展开对话，两个人都以孩子母亲身份并担任母亲的工作，我们甚至可以理解为两人都在从事愉快的工作，这同时也是名副其实的生产活动。^①

在 19 世纪，莫里索作为慈爱的母亲与专业的艺术家这两者的身份角色认同上是矛盾的。《奶妈与朱莉》因而变得比乍看之下要复杂的多，它所激起的矛盾对立可能与当时对工作与休闲两者怀有似是而非的迷思有关。将《奶妈与朱莉》解读为一幅工作的场景，不免让琳达·诺克林把它定位在 19 世纪绘画中对工作这个主题的呈现，尤其是女性工作者的工作景象。

^① A.Daumard, *Maison de Paris et propriétaires Parisiens au XIXème siècle*, Paris, 1965, p.127.



（图 2）《去外省赛马场》德加 1869 年 36.5×55.9cm 画布油画 波士顿艺术博物馆

在巴黎社会较时髦的地方，奶妈可以说是无处不在。这可从德加的《去外省赛马场》（图 2）^①里看出来，画面上瓦平松夫妇带着他们的狗、他们的儿子，以



（图 3）《晾衣物的女人》莫里索，哥本哈根 Ny Carlsberg Glyptotek
及孩子的奶妈，从她为婴儿的动作上即可看出她的身份。芬兰画家埃德尔菲尔特在描绘巴黎上流阶级生活的魅力时都会很自然地把奶妈包括进去。如修拉在《大碗岛星期天的下午》中，以极度几何化的笔法，将奶妈放进法国社会的横剖面。

绘画作品中的图像语汇所呈现的农村妇女与劳工妇女的工作状态有很多，如毕沙罗热衷表述农人主题，以至于整个 1880 年代的大多数作品都致力于描绘农村妇女与劳工妇女的工作与休息场景。莫里索自己曾多次描绘农村劳动的主题，还画过洗衣服的主题，其一是 1875 年的《晾衣服的洗衣妇》这是一张抒情的图画，职业洗衣妇在城市的环绕下辛勤地从事交易。另一幅是 1881 年绘制的《晾

^① Bergeron.Louis, *Paris: Genèse d' un paysage*, Paris, 1989.p.78.

衣物的女人》(图3)^①以近景观点呈现,画面上描绘的挂在晾衣绳上的床单和正在晾晒床单的洗衣妇,充分显示出洗衣妇的工作状态与工作成果。画家仿佛用洗衣妇的工作暗示了女性艺术家自己的工作。莫奈的《卸煤》、德加的《熨衣工》,以及卡耶博特的《擦地工》,主题都是取自城市无产取工资以贴补家用。

在解读“印象派”时,人们常常将女性的工作于休闲的概念联系整合在一起,无论她们从事的是服务业还是酒吧娱乐业,或者是画室模特,更或是贵族家里的工作,这致使我们观念里的描绘工作的图像被田间劳作的农人或工厂里做工的工人、还有织布机前的织布女工,这样的刻板印象给束缚住,而像酒店女招待或服务生这类题材便经常被排除在工作景象的类别之外,而被划归到休闲画中。

巴黎是19世纪世界的时尚之都。各种主题和场景中衣着时尚的女子几乎构成了马奈等印象派画家作品中现代都市生活的全部内容。在剧院和歌剧院,在林荫道上,在咖啡馆和咖啡厅里,在赛马场,在花园中,在公园里,在河岸边,在森林中野餐,在家庭室内。对穿着当代时装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女性及暗娼的描绘成为马奈、德加等大多数印象派画室作品的核心内容,因为巴黎本身就是“时装之都”。

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大多都在描绘了穿着时尚而华丽的巴黎女子。然而,时尚的巴黎女子与这一时期的法国时尚、女性气质和民族文化身份是紧密相连的。时尚巴黎女子作为时尚中产阶级女性是商场海报中频繁出现的形象。女性消费时装的目的是为了把自己变成时尚巴黎女郎,这就使她们陷入到无止境的时装购置中,比如搜寻时尚配饰,帽子、软帽、手套、围巾、鞋子、雨伞和阳伞等,还有适合早、中、晚穿戴的服装、斗篷和披肩。就如同迈克尔·米勒注意到的“女性不仅是穿外套,而且是穿各种场合的外套,如出访时的外套、旅行时的外套、舞会穿的外套、去歌剧院穿的外套。去城市时,她们备有城市礼服以及晚宴礼服。”为了搜寻、收集全套行头,中产阶级女性也要做一些手工艺活,如编织。全套时尚服饰搭配过程要求专业的技术。

巴黎充当着时尚巴黎女郎培育地的角色,对时尚巴黎女郎这一“形态”不论是解释还是神秘化,它作为时尚女性气质民族化身的神话已经形成,并在无数杂志、礼仪或其他书籍文章中广泛传播,这样伴随着时尚巴黎女郎形象在印刷文化中的增值。在同一时期,马奈等印象派画家也在他们的艺术中发动起这一神话,使时尚巴黎女郎成为现代生活画作中的显著形象。19世纪60年代最后五年莫奈的画作,比如《卡米尔》、《花园中的女子》和《草地午餐》(莫斯科普希金美术馆),证明从“印象派”诞生之日起,时尚巴黎女郎造型的现代女性就扮演了显著角色。19世纪七八十年代马奈等印象派画家在继续描绘衣着入时的巴黎女

^① Bergeron.Louis, *Paris: Genèse d'un paysage*, Paris, 1989,p.67.

郎。1875 年莫奈的《打阳伞的女子》，画中女子好像在她孩子的陪伴下在郊外散步。1874 年雷诺阿的《巴黎女子》中的女郎穿着时髦的蓝色服装，凝视着观众。1882 年马奈的《春天》里的女子在花园附近炫耀着自己的时尚。1875—1876 年莫里索的《在剧场前》表现了一位穿着优雅晚礼服迈步向前的女性。1879 年卡萨特的《一杯茶》和马奈的《在温室中》都表现了穿着时髦午后礼服就坐的女子。时尚巴黎女郎充斥着印象画派画家的画作，演绎了由巴黎时装定义的都市女性气质，成为描绘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成分。

印象派画家将巴黎女郎描绘成穿戴着最新时装与装饰品的当代女性，他们不仅在城市环境中，也出现在乡村里。左拉为莫奈 19 世纪 60 年代的画作写评论时，注明自然风景中的巴黎女郎穿时装是为了给自然增添城市的当代性与特殊的巴黎风味：他喜爱女子的阳伞、手套、薄纱，甚至假发和化妆粉，每样东西都使她们成为“文明的女儿”……就像一位真正的巴黎人，他把巴黎带到乡村中，他无法画没有衣着优雅的绅士与淑女在场的风景。他似乎对没有刻下我们习俗印迹的自然失去了兴趣。

艺术家们描绘的巴黎时尚的女性无不是穿着雍容华贵，配饰精细。巴黎的时尚服饰文化召唤着从上层富有的女士到中产阶级女性和财力平乏的劳动阶层的女子等更为广泛的社会女性，使她们能够追逐着巴黎时尚的步伐。

第六节 巴黎下层阶级与资产阶级以及贵族的心态对照

纵观法国以及巴黎整个工业文明发展的进程，以及把它与同一时期的英国和美国做对照，明显可发现它的发展比较缓慢，相对滞后，即使是工业化最为昌盛的第二帝国时期也是如此。这个结论已经是整个法国史坛的共识，然而探究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法国工业化发展缓慢的特点一直是法国史学家热衷探讨的问题。

除了社会机制这些制度层面的原因，探究社会存在的状态，分析不同阶级之间的心态，心态的不同同样会导致阶级间的冲突，由此也可窥探出法国工业化发展缓慢的原因。

（一）法国中上层阶级（主流）的社会心态

回顾法国的历史，第一个发展的高峰就是路易十四时期。路易十四推崇的古

典主义的审美以及贵族优雅繁冗的生活方式及风尚成为了当时法国社会甚至整个欧洲上流社会模仿的对象。路易十四强大的野心希冀把巴黎建设成超越“罗马城”的存在。从那个时候开始，“尚古”的审美品味，尤其是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推崇仿佛一直流淌在法兰西民族的血液里。在路易十四的带动下，法国贵族社会对于优雅、品味和精致生活的追求达到从来未有的高度，并且影响了整个法国社会。

19 世纪的法国贵族式微，资产阶级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了法国社会的中坚力量。资产阶级是伴随着工业化和机器大生产而产生的。工业文明诉诸效率和准确，这与贵族式缓慢而精致的生活节奏背道而驰，然而这种流淌于法兰西民族的“缓慢”再次在资产阶级上发生了效用。一旦资产阶级通过财富成为了社会上流人士，他们又开始模仿起贵族式的生活行为和方式。

对工业文明的排斥一直是 19 世纪许多法国人心态的关照，甚至是法国当今社会，这种思潮仍有市场。从季奥诺的“乡村主义”的小说一直到 2008 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勒克莱齐奥所著的小说中，“推崇乡村田园生活，排斥现代工业文明”一直是他们小说不变的母题。法国的基础教育中，特别重视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学习，这种对“厚古薄今”的审美观影响了法国整个主流社会，这种心态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法国工业化发展的“缓慢”。

（二）下层阶级的社会心态

不同于上层社会优雅精致的生活，下层阶级的民众是没有闲情逸致来享受上层社会那种“华丽而无用”的生活方式的。下层民众的生活是实用且功利的。农村过剩的劳动力涌入巴黎，在巴黎奋斗打拼的目的是希冀把在农村的整个家庭一起搬到巴黎居住。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对他们有着致命的吸引力，物质生活条件的相对提升，时尚的生活方式，漂亮的服饰等等所有这些对下层民众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他们渴望融入工业文明，享受工业文明的成果，否则他们仍然会过着过去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封闭生活。

工人阶级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而诞生的，他们依靠技术等本领养活自己甚至全家，他们的生活节奏是机器化的，劳动是他们唯一依靠的手段。虽然有很多的思想家认为工业文明带给工人阶级的只有苦难与痛楚，认为他们是工业文明的牺牲者，但是也有批思想家如本文提到的孔德等人坚决为现有的工业制度和社会体制辩护呐喊，他们一致认为只有工业文明才能带来国家财富和社会的进步，实现理想的“文明社会”。思想家为此问题争论不休，那工人阶级的心态又是如何？他们并不会对自身的处境和社会思考过多，但是从他们的生活状态来说并没有人们认为的那么糟糕，他们对工人的生活状态还是基本接受的，除了维持基本的生

活外，大多数工人还是用于其他娱乐生活的开支。而且作为新的阶级群体，他们的生活是积极向上的，心态是年轻的，他们乐于融入工业文明，而非上层社会那种排斥的心态。

致谢

三年的博士生生活一晃而过。回想走过的岁月心中倍感充实，论文即将完成之日感叹良多。首先诚挚的感谢我的导师陈恒教授从论文的选题、材料的选择以及论文的定稿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倾注着他的心血。陈老师以严谨的治学之道、宽厚仁慈的胸怀、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为我建立了一辈子学习的范例，他的教导与鞭策将勉励我在科研的道路上励精图治开辟创新。

我要以最诚挚的心意感谢上海师范大学洪庆明教授以及裔昭印教授对我三年来学习上的指导和生活上的关心。尤其洪老师和我专业对口，他给我的帮助良多。

最后我也要感谢陪我一路走来的同学们，他们陪我度过了枯燥的治学生涯。他们在我心情低落时为我分忧，在我信心不足时给我打气，从生活的点点滴滴

中给我赞助、给我勉励。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硕士导师郑克鲁教授，他是一位翻译大家，一位耄耋老人仍然坚持每天工作八小时，从他身上我看到了知识分子对学术的热诚和坚持，深受感动。

结论

自古以来,巴黎就是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城市,巴黎和法国之间似乎可以划上等号。人们说到巴黎就会想到法国,而说到法国人们脑海里首先浮现的可能就是巴黎。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其《法兰西的特性》中说到巴黎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巴黎、法兰西岛和巴黎盆地毕竟创建了法国,这是千真万确的事”。^①另一位历史学家弗朗西·于雷也形象的指出:“如果把法兰西岛当作一个硕大无比的细胞,巴黎则是其雄性细胞核;它们拥有旺盛的食欲,不顾一切地去完成一项遗传工程,终于导致了国土呈六边形的法国”。^②巴黎的发展和法国的历史成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巴黎就是法国的中心。纵观整个法国史,巴黎凭借其自然地理位置以及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巴黎即法国”的说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所以研究法国的历史,巴黎城市史是重中之重。

法兰西第二帝国是法国历史上工业化进程发展最为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巴黎这座古老的城市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奥斯曼的巴黎改造计划使得整个城市焕然一新,巴黎借此成为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明星都市”。第二帝国对于整个巴黎城市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9世纪第二帝国的法国是个社会经济急速变化的社会。政治领域,革命浪潮此起彼伏,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的弄潮儿,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经济领域,工业革命带来的冲击造成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农业生产力得到提高,农村人口较快增加。但由于农业生产所需劳动力的减少,反而导致农村的人口过剩,农村经济出现萧条的景象。工业的发展,使得城市成为工业生产的中心,城市逐步跳出中世纪,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里经济的集聚点。农村人口的流入和城市自身人口的增长使得整个19世纪城市人口增长很快。在巴黎,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成为19世纪最重要的字眼。经济的发展吸引更多的人涌入巴黎,人口的增加又为巴黎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的空间显得越来越小,狭窄、曲折的道路越来越不适应大马车的行驶;街道也显得越来越拥挤;城市的各项基础设施也越来越不堪重负。从城市的发展史来看,19世纪以前是西方历史中的中世纪,当时社会经济活动相对简单,城市经济功能主要是为统治阶级服务。所以目的简单,表现在城市建筑形态上,一般在市中心是宏伟的宫殿、宽阔

^① 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顾良,张泽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47页。

^② 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顾良,张泽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48页。

的广场和周围低矮的房屋，此时的街道主要是应步行和小型运载工具的要求而产生。在主要以人的尺度为基础城市空间中，街道都是狭窄、曲折的。

随后，社会经济的发展让城市产生了改造的需要。这主要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交通系统发生改变，而交通系统的改变又导致人口进一步向城市集中，这主要是以 19 世纪铁路的发展为代表。同时在城市内部，经济活动也越来越活跃。这就要求城市具有便捷的道路系统，以适应以四轮马车、有轨马车为代表的新的经济活动的需要。这种新情况导致 18、19 世纪欧洲的大部分城市面临着一场更新运动，这场更新是以工业革命为代表的新经济对农业经济为代表的旧经济的胜利；是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胜利。19 世纪中叶，拿破仑三世决定要美化巴黎，把巴黎建成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在拿破仑三世的支持下，奥斯曼从 1853 年开始着手对巴黎进行一场工程浩大的改造。通过三个阶段的改造，奥斯曼重建了巴黎的道路系统，拆毁了大片传统老旧街区，把迁回狭窄、潮湿肮脏的市中心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同时，他兴建了下水道系统和城市供水系统等基础设施，方便了市民的生活。通过改造，取直了道路，城市空间变得更加开阔；破旧建筑拆除了，城市变得更加美丽；城市基础设施完善了，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社会结构特征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后者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在具体表象上，传统社会以出身门第为确定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的唯一标准。一个人在门第系统里的地位，也就是他在社会中的地位，其地位不是凭自己的业绩而获得，而是由他所出生的那个家庭、阶层或阶级所决定。社会很少给社会成员提供升迁变化的机会，社会结构本身也就缺少发展变化的弹性，显示出其僵化封闭的特征。与此相反，在现代社会中，门第关系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变得无足轻重，个人能力的大小，占有财富的多寡和社会认可程度的高低，成为决定社会成员社会地位的主要依据。每个社会成员都可能通过个人积极进取而接近或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原本居于高位的社会成员或群体也可能向下滑落。社会成员或社会阶层之间这种双向的流动变化，显示了现代社会结构的开放特质。大革命以后一个多世纪的法国经历了上述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结构演变。

帝国时期的住宅问题，下层妇女的劳动以及教育问题，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尤其显著不同的特点。帝国时期下层阶级与上层阶级的抗争也显示出日趋严重的情况。首先反映在社会思潮的冲突和整合，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一方面是工业化启动及其基本完成，另一方面是政治上处于不断革命与动荡之中，古老的封建残余十分顽固，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激情以及工业化带来的新的激情不断催生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波，一心一意谋求秩序的统治集团一次次陷入手足无措的境地，人们大都持毫不妥协的见解，稳重深刻的意见常常受到冷遇，这种情况直到

1870 年代才发生重要变化，法国工业化时期的历史远比我们以前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19 世纪法国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发展，各方新兴势力的风起云涌，经济生活的变化、自然科学的发展及人们思想的转变等，致使旧有的阶级制度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传统的乡村生活模式也随着工业革命而转变，旧贵族阶级从各个方面逐步走向衰落，新兴阶层慢慢崛起，资产阶级整体兴起，现实主义、印象主义等艺术流派也随之应运而生。绘画题材发生了巨大变化，而绘画题材的变化与画家所处的阶层有莫大的联系。画家描绘的日常景象，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劳作的情景，小资阶层闲暇时的公园漫步、咖啡馆闲谈、周末聚餐、欣赏歌舞表演等等，均是自身所处阶层发生的事件或亲眼所见。1858 年 1 月 14 日，在巴黎发生了奥尔西尼刺杀法国皇帝路易波拿巴的事件，马克思就此事写下了通讯《对波拿巴的谋杀》，分析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国内局势。本文从一个侧面展现出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新闻统制的紧张与脆弱，论证了生存其中的“公赛支持”的报刊与“公众支持”的报刊及其所反映的民意之间的角力，提出并回答了报刊与人民关系这一命题。

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城市改造运动，不仅对巴黎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对法国其他城市的改造，甚至是整个世界城市的更新与发展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在巴黎的带领下，里昂、马赛以及波尔多这些城市在 19 世纪也经历了巨大变化。在世界范围内，19 世纪布鲁塞尔的旧城市改造运动深受巴黎的影响，甚至是当时新建的墨西哥城就是以巴黎为范本，美国纽约的“都市更新计划”也受到巴黎改造运动的多重启发。

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对于巴黎这座城市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巴黎之所以成为今日的巴黎就是由于帝国时期的巴黎城市改造运动奠定的基础，巴黎现在的城市外貌其本于帝国时期差不多。同时，任何城市面临转型期的时候不免会产生城市的阵痛，下层民众在社会剧烈变革时期的生活状态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问题，研究这一时期的巴黎城市的发展以及下层阶级社会的情况对我国城市的发展也具有相当大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法语

- 1.AAlphand, *Les Promenades de Paris*, Paris, 1970.
- 2.A.Cochin, *Paris: Sa Population, Son Industries*, London, 1977
- 2.A.Daumard,ed. *Les fortunes francaises au XIXème siècle*, Paris, 1977.
- 3.A.Daumard, *Maison de Paris et propriétaires Parisiens au XIXème siècle*, Paris, 1965.
- 4.A.J.Tudesq, *L'E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e Louis-Napoléon Bonaparte 10 décembre 1848*, Paris, 1965.
- 5.Bardet Gaston, *Naissance et méconnaissance de l'urbanisme*, Paris,1951.
- 6.Bidou. Henry, *Pairs*, Pairs,1937.
- 7.B.Le Clère, et V.Wright, *Les Préfets du Second Empire*, Paris, 1973.
- 8.Bergeron.Louis, *Paris: Genèse d'un paysage*, Paris ,1989.
- 9.Bowie.Karen, ed. *la modernité avant Haussmann:Formes de l'espace urbain à Paris*, Paris, 1801-1853.
- 10.Citron.Pierre, *La poésie de Paris dans la littérature francaise de Rousseau à Baudelaire* ,Paris,1961.
- 11.Delotel, *Aux origines de la Commune: le mouvement des réunion publiques à Paris,1868-1870*, Paris, 1980.
- 12.Durier.Guy, *Mémoires du Baron Haussmann*, Editeur Paris, 1979.
- 13.F.Caron, *La France des patriotes de 1851 à 1914*, Paris, 1985.
- 14.G.Duveau, *La vie ouvrière en France sous le Second Empire*, Paris, 1946.
- 15.I.Tchernoff, *Le Parti républicain au coup d'état et sous le Second Empire*, Paris, 1906.
- 16.J.Becker et Rouzeau.S.Audoin, *La France,la Nation, La Guerre: 1850-1920*, Paris, 1995.
- 17.J.Bernard, *Les Deux Paris:Les Representatins de Paris dans le Second Moitié du XIXème Siècle*, Paris, 2001.
- 18.L.Chevalier, *La Formation de la population parisienne au XIXème siècle*,Hachette, Paris, 1950.
- 19.Loyer Francois, *Paris XIXème siècle:mL'emmeuble et la rue*, Paris, 1985.
- 20.L.Girard, *Nouvelle Histoire de Paris.La deuxième république et le second empire*,Paris,1981.
- 21.L.Girard, *La Politique des travaux publics du Second Empire*, Paris, 1951.
- 22.Lavedan.Pierre, *Nouvelle histoire de Paris*,Hachette, Paris, 1975.
- 23.Braudel et Labrousse, *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Hachette, Paris,1976.
- 23.Marchand.Bernard,*Pairs , histoire d'une ville au XIXe-XXème siècle*,Editions du Seuil,1993.
- 24.Merriau.Charles, *ouvenir de l'Hotel de Ville de Pairs — 1848-1852*,Pairs,1975.
- 25.M.Daumas et J. Payen,eds. *Evolution de la Geographie Industrielle de Paris et Sa Proche Banlieue*, Paris, 1976.
- 26.P.L'évêque,*Société en crise, La Bourgogne de la Monarchie de Juillet au Second Empire*, 2 vols, Paris, 1983.
- 27.Pinon.Pierre, *Atlas du Paris hausmannien: La ville en héritage du Seconde Empire à nos jours*, Paris,2002.
- 28.Pinon.Pierre, *Paris:Biographie d'une capitale*, Paris, 1999.
- 29.R.Audiganne, *Les Ouvrières et les Industries de La France dans le Mouvement Social du XIXème Siècle* , Paris, 1854.
- 30.R.Apponyi, *De la révolution au coup d'état*,Geneva, 1948.
- 31.R.Becherer, *Scienceplus sentiment:Cesar Daly's Formula for Modern Architecture*, Ann Arbor,

Mich, 1984.

32.R.Bellet, *Press et Journalisme sous le Second Empire*, Paris, 1967.

33.Rouleau.Bernard, *Paris:Histoire du'un espace*, Paris, 1997.

34.St.Cadoux, *Les finance de la ville de Parisd de 1789 à 1900*, Bergert, 1990.

35.Saint,Gaillard., *Paris , la ville 1852 — 1870*,Champion, Paris, 1976.

36..W.H.C.Smith, *Second Empire and Commune:France 1848-1871*, Hachette, 1985.

(2) 英语

1.C.Boyer,*The city of Collective Memory: Its Historical Imagery and Architectural Entertainments*, Cambridge,Mass, 1994.

2.C.Johnson, *Utopian Communism in France: Cabet and the Icarians,1839-1851*, Ithaca, New York,1974.

3.D.Baguley, *Napoleon III and His Regime*,Baton Rouge,2000.

4.D.Charlton, *Positivist Thought in France During the Second Empire,1852-1870*,Oxford,1959.

5.F.Jellinek,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London,1937.

6.G.Becker.ed, *Paris Under Siege,1970-71: From the Goncourt Journal*,Ithaca,New York,1969

7.G.Pollock, *Vision and Difference:Femininity,Feminism and the Histories of Art*, London, 1988.

8.J.Beecher, *Victor Considerant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French Romantic Socialism*, Berkeley, 2002.

9.J.Dargan, *Balzac and the Drama of Perspective*,Lexington,1985.

10.L.Marx,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London,1964.

11.M.Gandy, *The Paris Sewers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Urban Space*,London,1999

12.M.Agulhon,*Marianne into Battle: Republican Imagery and Symbolism in France, 1789-1880*,London,1981.

13.P.Ferguson, *Paris as Revolution: Writing the 19th century City*,Berkeley,1994.

14.R.Anderson, *Education in France,1848-1870*,Oxford,1975.

15.S.Prawer, *Karl Marx and World Literature*,Oxford,1992.

16.T.Clark, *The Painting of Modern Life: Paris in the Art of Manet and His Followers*, London, 1984.

17.T.Ellingson, *The Myth of the Noble Savage*,Berkeley,2001.

18.W.Haine, *The World of the Paris Café*,Baltimore,1996.

(二) 中文文献:

(1) 译著

1.卡洛·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四卷上册),王铁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

2.杰罗姆·凯根:《三种文化:21世纪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王加丰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3.让·马蒂耶:《法国史》,郑德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

4.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顾良、张泽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

5.弗朗索·瓦卡隆:《现代法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

6.瓦尔特·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7. 艾伦·W·埃文斯：《城市经济学》，甘士杰、唐雄俊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年。
8.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傅雷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
9. 安德鲁·哈塞：《巴黎秘史》，刑利娜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
10. 乔治·杜比（主编）：《法国史》，吕一民、沈坚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
11. 罗杰·普赖斯：《拿破仑三世和第二帝国》，朴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
12. 左拉：《巴黎》，毕修勺译，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年。
13.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一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年。

（2）专著：

1. 王章辉、孙娴（主编）：《工业社会的勃兴》，人民出版社，1995年。
2. 许平：《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3. 端木美、周以光、张丽：《法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4. 沈坚：《近代法国工业化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5. 刘宗绪（主编）：《改变世界历史的二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
6. 张芝联：《法国史论集》，三联书店，2007年。
7. 钟纪刚：《巴黎城市建设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
8. 张仙桥、洪民文主编：《住宅社会学概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
9. 宛素春：《城市空间形态解析》，科学出版社，2004年。
10. 梁承庭：《法国巴黎公共交通研究与借鉴》，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1990年。
11. 沈玉麟：《外国城市建设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
12. 世界大城市规划与建设编写组编：《世界大城市规划与建设》，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

（3）学术论文

1. 邹耀勇：《古代巴黎城市发展略论》，载《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2期。
2. 蒋浙安：《论近代巴黎的城市改造》，载《当代建设》，1998年第四期。
3. 张永仲：《历史中的巴黎实践创新》，载《规划师》，2002年第2期。
4. 刘健：《巴黎：城墙内外的城市发展》，载《国外城市规划》，2003年第4期。
5. 曹刚、王深：《巴黎地区的发展与规划》，载《国外城市规划》，2004年第5期。
6. 于一凡：《城市交通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简析法国巴黎大区交通策略的发展与变迁》，载《国外城市规划》，2004年第5期。
7. 曾刚：《法国巴黎区的规划与整治及其对上海建设的启示》，载《世界地理研究》，1997年12月第6卷第2期。
8. 朱晓龙、王洪辉：《巴黎工业结构演变及特点》，载《国外城市规划》，2004年第5期。
9. 陈崇武、金晓常：《关于法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特征问题》，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10. 楼均信：《试论法国的工业近代化》，载《杭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11. 王家宝：《试论法国第二帝国现代化的条件》，载《世界历史》，1991年第1期。
12. 计翔翔：《近代法国城市化初探》，载《世界历史》，1992年第5期。
13. 王家宝：《近代法国人口量变轨迹与原因》，载《世界历史》，1994年第5期。
14. 汪建丰：《略论1830—1870年法国铁路建设》，载《史学月刊》，1991年第2期。
15. 崔王：《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土地政策的再认识》，载《世界历史》，

1983 年第 2 期。

16.安然:《论法国大革命的成就、局限及其原因》,载《辽宁大学学报》,2003 年第 3 期。

17.李益彬:《法国小农经济对法国历史的影响再探》,载《历史教学问题》,2006 年第 2 期。

18.张庆海:《大革命前后法国农业近代化的本质特征》,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 年第 2 期。

19.施成:《19 世纪晚期法国共和政体最终确立的原因》,载《历史教学》,2003 年第 7 期。